

旅行與再現：

晚清英法美遊記的政教空間與權力展演

張 惠 珍^{*}

摘 要

以同治、光緒年間，首批從「天朝上國」親臨「地上世界」的清廷外交官員、知識分子的身體移動和遊歷書寫為研究對象，並聚焦於清人出訪英、法、美國的國族政教空間為探討範圍。援引後現代歐美學者關於現代西方文明的研究成果，借鑑法國經濟史學家布勞岱爾、傅柯的空間與權力論述、文化地理學等理論，藉以逼顯列強政教空間所展演的權力滲透與空間意義。並對照前現代晚清知識分子親歷現代西方文明現場的觀察和詮釋，深入剖陳旅人感知的文化衝擊和幽微心理。冀能透過前、後現代與東、西方的理論闡釋和現場觀察，產生跨文化、跨時代對話的知識火花，逼顯多重詮釋下的空間意涵。

關鍵詞：晚清、歐美遊記、空間、權力、現代性

* 作者現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講師。

Travels and Representation:

Political-Religious Sphere and Performative Pow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France and America in Late- Qing Travel Journals

Huei-chen Cha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ravels and writing of late-Qing China's ambassadors and intellectuals, who first left the "heavenly dynasty" to visit the "earthly world" during the Tongzhi and Guangxu period, by focusing on the political-religious sphere they observed in the British Empire, France, and America.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scrutinizes the diffusion and performativity of power in the western political-religious sphere, which was inspired by the works of postmodernist scholars such as Fernand Braudel and Michel Foucault on space-power relation as well as cultural geography, to reveal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it. It then compares this kind of western perspective with the bodily experienc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late-Qing's pre-modern travellers, in order to

^{*}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ach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culture shocks and mental states. By juxtaposing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field observation, the pre-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 the occidental and the orienta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reate a spark of intellectual light, exposing a more diverse reading of space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culture and time.

Keywords: Late-Qing dynasty, travel journals of Europe and America, space, power, modernity

旅行與再現：

晚清英法美遊記的政教空間與權力展演^{*}

張 惠 珍

一、前言

15世紀揭開大航海時代的序幕以降，經歷工業革命洗禮後，西方國家爭先恐後的對內、對外展開現代化競賽，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結合成所向披靡的世界冒險武器。現代化城市與殖民帝國並肩崛起，大舉降服了自然險阻和人為障礙，大幅挪動固有的民族國家疆界，西方一躍成爲世界舞臺的中心，揭開主導人類歷史發展的新局面。從此，西方國家儼然是現代和進步的代名詞；西方人宛如新世界人類的主人；西方文明幾乎代表人類世界的高度文明。相對於冒險犯難、開疆闢土的西方世界，清廷君臣仍據守東亞一隅，固執於天朝上國的自我想像，昧於國際現勢和外洋情況，以致錯失平等建交、互換使節的機會。¹直到道光、同治年間兩次中英戰爭（1840年、1860年）

^{*} 本文承蒙多位審查委員的高見提點，特此致謝並戮力修正。惟礙於篇幅與時間所限，未能悉數達成囑咐者，如晚清外國遊記中的身體與國體、歐美旅行對個別旅人的觀念和行動影響、旅者的空間認知與觀念變化是否促成救國論和行動改變、中國獄政改革等，至盼俟諸另文再回應寶貴建議。

¹ 中國與外國正式互派常駐使節之議，早在清乾隆時代（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由英國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率來華使節團首開要求之例，結果被清朝「天子」以「與天朝體制不合」而婉拒。

的敗績，清廷被迫簽訂城下之盟，才勉強接受外國公使駐京的要求。遲至咸豐、同治、光緒年間，始陸續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咸豐十一年，1861年，二次中英戰爭後清廷為辦理外交事務和洋務而設）、開辦同文館（同治元年，1862年，清廷為培養西方語言人才而設）、首度派員出國遊歷考察（同治五年，1866年）、²正式派出首位中國公使郭嵩燾（1818-1891）駐節英法（光緒二至五年，1876-1879年）³等洋務史上的創舉，也開啟出洋遊歷與中西交流的契機。

旅行，既是身體、空間的移動，也是接觸、體驗不同文化的行動。對晚清人來說，出洋遊歷，茲事體大，旅者多肩負考察列強國情、疏通中外隔閡，甚至尋求救國處方等重責大任。本論文將以同治、光緒年間，首批從「天朝上國」親臨「地上世界」的清廷外交官員、知識分子的身體移動和遊歷書寫為研究對象，⁴並以清廷首派公使

² 參見鍾叔河：〈中土西來第一人〉，連同斌椿：《乘槎筆記·詩二種》，收於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冊1（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1983年），頁68-69。清廷派員出洋考察，始於清同治五年（1866），總其事者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始倡其議者則是英籍中國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同治五年（1866）春，清廷終於派出滿族近臣斌椿（1804-?）父子，率領旗人出身的同文館學生一行五人，隨總稅務司赫德返國休假省親之便而遊歷歐陸諸國。此行目的意在考察外國國情，化解中外隔閡，俾便辦理交涉事件。

³ 參見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收於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冊4（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1983年），頁10。光緒二年（1876），清廷終於派出第一位奉旨出使的欽差大臣郭嵩燾（1818-1891），臨危受命為清國出使英國兼使法國（光緒二至五年，1876-1879），為中國駐節西方國家之始。惟清廷首度正式派員出使外國，實迫於英人威逼。光緒元年（1875）春英國翻譯官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雲南遇害事件後，駐華英使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強索條約並簽訂「案結後即派員出洋」。

⁴ 本論文所引遊記文本，收錄於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1-10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1983年），從下不再繁引。叢書規模宏富，書前皆撰有序文介紹作者並導讀論著，內容扼要平實，頗富參考價值。論文採擇的清國旅人的旅行文本計11人15種，茲列示冊數、作者、書名、出訪年份如下：冊1斌椿《乘槎筆記》（1866）；冊1張德彝《航海述奇》（又名《一述奇》，1866）、冊1《歐美環遊記》（又名《再述奇》，1867-1870）、冊2《隨使法國記》（又名《三述奇》，1870）、冊7《隨使英俄記》（又

駐節的英、法兩殖民帝國與新大陸崛起的美國，清人出洋必訪的國族政教空間為探討範圍。問題聚焦於清國旅者對空間地景的體驗和再現，探討列強諸國所展演的空間意義，剖陳旅人感知的文化衝擊與自我反思等心理機制。研究方法方面，獲益於前行研究的諸多啟發外，筆者嘗試援引歐陸學者關於近現代西方文明的研究成果作為理論準備。透過法國年鑑歷史學派、經濟史學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1902-1985）的論著——費時25年完成的三卷經濟史鉅作《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1979），⁵將有利於廓清近代西方文明的發展背景與演變脈絡。再導入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的觀察角度，探討群體文化如何散佈於空間並賦予空間意義，以及這些文化如何形成認同，讓人得以辨識自我和他者之間的差異。文化地理學的開端可上溯到16世紀。西方航海家、地理學家和旅行家們，透過旅行紀錄異國文化的文本，充實了地理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材料，二者的交匯正是文化地理學的前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地理學和人類學這兩門學科，都與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

名《四述奇》，1876-1879）4種；冊6王韜《漫遊隨錄》（1867-1870）；冊1志剛《初使泰西記》（1868-1870）；冊6李圭《環遊地球新錄》（1876）；冊4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1876-1879）；冊7劉錫鴻《英輶私記》（1876-1877）；冊5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1878-1886）；冊8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1890-1894）；冊10梁啟超《新大陸遊記》（1903）；冊10康有為《意大利遊記》（1905）、冊10《法蘭西遊記》（1907）2種。以下論文凡有引文，首度引用時採隨頁注詳示出處，重複徵引時改用簡要提示，逕於引文後以（作者，頁數）註明來源，同一作者有不同引文出處時以（作者：書名，頁數）加列書名。引文文字加深部分為筆者所加，以示重點強調。承蒙匿名審查委員提議：將徵引遊記文獻（尤其方塊引文）前標明年代，較易進入文獻所述地景空間的時間脈絡。筆者將於首度徵引旅行文獻時，在論文中簡介旅者及其旅行動機、時間等背景。但為避免重複徵引時的體例冗贅，謹循撰稿格式在此以括弧提示全部旅行文本的西元旅行年份。

⁵ 費爾南·布勞岱爾著，施康強、顧良譯：《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1-3卷（臺北：左岸文化，2006年）。

生物學和歐洲帝國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此外，也將借鑑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有關權力與空間的論述。在《瘋癲與文明》（*Folie et deraison*，1961）、《規訓與懲誡》（*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1975）等系列著作中，傅柯持續開展空間、權力、身體和知識的探討，時空跨度涵蓋西方中世紀、古典時期到現代時期。他強調：空間的存在，讓權力得以縱橫其間，使權力有了實踐和展示的可能，空間或建築成爲權力實踐的重要機制。因此空間裝載了意義，空間的形式與布局在象徵結構中彼此結合，而人的「可見性」（visibility），正是身體作爲權力運作空間的關鍵。透過特定空間的設計，在「權力之眼」的凝視下，主從關係與權力運作遂得以確立。⁶藉由引進上述後現代歐陸學者針對西方文明的論述成果，對照前現代晚清知識分子親歷現代西方文明現場的觀察和詮釋，冀能產生跨文化、跨時代交流與對話的知識火花，逼顯多重詮釋下的空間意涵。

論文將隨著清國旅人的步履和視野而進入殖民強權英法美三國的首都，先一窺國都的整體風華，再特寫帝國的政教空間，分別從神聖與紀念的空間地景、理性與教化的空間地景，循序探究政教空間呈現的複雜樣貌與豐富意蘊，以及中國旅人置身其間的表意實踐與幽微心理——聚焦於政教空間所展現物質、精神文明與現代性反思。

二、神聖與紀念的空間地景

清人旅行與再現的「神聖與紀念的空間地景」，亦即「以國家之名」而建築的空間地景。如象徵國家的首都，以及國會、皇宮或總

⁶ 詳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2002年），頁375-379、385-397、399-409、411-422、540-541。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的物種演化論認爲較具活力的物種會積極拓展生存空間，並逐漸控制、取代和淘汰較無活力的物種。此說後來被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所挪用。本文有關人文地理學的理论認知和詮釋，深受此書內容啟發。

統府、開國紀念地或英雄紀念碑等國家歷史地標 (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作為西方列強爭逐海外市場和殖民利益的根據地正是城市，尤其是代表殖民帝國的心臟——首都。以征服者之姿而崛起的歐洲，在一座座超級城市興起的同時，第一批現代國家的隊伍也宣告形成。布勞岱爾有言：「世上一切繁華，莫不在西方臻於鼎盛」，「城市造就了歐洲這塊狹小大陸的偉大」，「在西方，資本主義和城市實際上是合二而一的」。⁷ 歐美新興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國家和城市變成命運共同體，兩者關係密不可分。於是，「葡萄牙的財富集中到里斯本，荷蘭的精華全在阿姆斯特丹，而英國的霸權就是倫敦的霸權」。⁸ 布勞岱爾分析殖民帝國首都的共性：首先，它們全以五方雜處、開放寬容為特徵。它們既是萬物輻輳之地，更是萬國子民匯集之處。其次，突出的社會階級分化。大城市聚居著王公貴族、財富傲人的資本家、新興崛起的中產市民，以及沒錢沒勢的無產者、勞動者。它激勵人們的逐利之心，在生活水準和物價水平快速成長的同時，富者更富，窮者益窮。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特色是，它們都是被其他城市所供養、效力和服務，它們是占據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城市。

(一) 英國倫敦 (London)：大英帝國首都，歐洲第一、世界最大城

英國在 18 世紀領先成為世界第一個工業化國家，在最強盛時期的 19 世紀到 20 世紀初，擁有全世界 1/4 的陸地，成為人類史上面積最大的國家，號稱日不落帝國。首都倫敦，位居帝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成為當時歐洲最大的城市、世界最大的城市，更是大英帝國強大生命力的象徵。帝國的國運昌隆、府庫豐裕，富人貴人紛紛遷

⁷ 費爾南·布勞岱爾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卷 1，頁 663、669。

⁸ 費爾南·布勞岱爾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卷 1，頁 669。

居首都。首都倫敦作為大英霸權最佳的現代性展演舞臺，匯入來自世界各國的淘金客和獵奇旅客，還包括前來西方取經的中國旅人：

入暮，燈光輝煌如晝，真如不夜之城，長明之國。……地中亦設有長渠，以消污水。……各家壁中咸有泉管，有塞以司啟閉，用時噴流如柱，不患不足，無穿鑿綆級之勞，亦無泛濫之慮。每夕燈火，不專假膏燭，亦以鐵筒貫於各家壁內，收取煤氣，由筒而管，吐達於室，以火引之即燃，朗耀光明，較燈燭之光十倍。……肆中各物，類皆精巧絕倫，列置玻璃窗中，表裡透徹，歷歷如繪。……都中橋梁之制，多高華瑰瑋，有石砌者，有鐵鑄者，然最奇莫如懸橋，互空飛渡，遙望之如長虹之環天而遠勢，工制獨創，尤為中土所稀。（王韜：《漫遊隨錄》，頁91-92）

落拓鄉間的不第秀才王韜（1828-1897），因緣際會地加入上海墨海書館，協助編校西書漢譯與出版長達13年之久。後因上書太平天國事件被清廷通緝而逃生投靠香港英華書院院長英國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並參與中國經典英譯計畫。同治六至九年（1867年冬到1870年春），理雅各返國，力邀王韜同行並長駐英國。《漫遊隨錄》即其旅居英國、漫遊歐陸兩年多的記錄。長期置身華洋雜處的上海租界和香港殖民地，洋場才子王韜的知識結構與文化視野已然迥異於傳統士紳階級。加上長時間親歷歐陸並有西人伴隨的可貴經驗，王韜對於英國的觀察體驗自有一般旅人走馬看花所不能及的獨到處，更與《瀛寰志略》、《海國圖志》等糾合西人文獻而想像的外國印象迥不相侔。

上文引述王韜觀察、紀錄倫敦大都會的公共建設，不僅具體而微地陳述表象、言簡意賅地說明構造原理，更暗中比較中、英基礎建設的長短：自來水便利家戶取用而不患不足，無（中國）打井取水之勞或泛濫之慮；煤氣燈也較（中國）燈燭光亮十倍有餘。燈火輝煌的不

夜城，是拜煤氣燈照明系統所賜；街道能夠長保潔淨，是下水道系統發揮功能所致；精巧絕倫又陳列得當的商品櫥窗，既是刺激消費也是鼓勵生產的互動循環；至於道路橋樑的四通八達，高華偉奇，不僅具備便利運輸的實用功能，更代表卓越高超的科學技術和設計美學。末句實概括指出倫敦帝都種種公共建設的發達便利，俱為「中土所稀」。對於被迫長期流亡在異質空間上海「租界」與香港「殖民地」的王韜來說，不僅讓他開啟另類的謀生管道和知識視野，使他提早擺脫天朝上國、大漢沙文主義等自我想像；也使他擁有相對開放的表意自由，可較無顧忌地進行言說。故能藉強調現代化物質文明的優異，盛譽英倫「風景清美」、「洵樂土也」，以影射中國不如英國的現實。

英國京城，泰西第一大都會也。……人煙之稠密，市肆之繁富，屋宇之高聳奇崛，街道之斜直紛歧，誠乃名不虛傳。……居人約四百萬，外來士商，無國無之。……電線通達各處……輪車鐵路若蛛網……。衛城兵五千名，衣紅衣青褲或黑衣，帽制以黑熊皮，高大如斗，……終日持槍巡守無倦容。巡捕八千名，衣黑衣，纏革帶，帽用黑氈，持短杖，各街巷分段鵠立，勤謹安分。行人往來，肩摩踵接，安靜無嘩。……地底穴道以行火輪車……恍惚又一世界。是緣地狹人稠，諸國交會，街衢行人車馬已不勝擁擠，乃創為地道，庶便往來也。（李圭：《環遊地球新錄》，頁 278-280）

李圭（1842-1903）曾任清朝海關造冊處、寧波海關稅務司、浙江寧紹道臺薛福成（1838-1894）的洋務委員，頗具結交西人經驗，西學和洋務認知亦早。《環遊地球新錄》即其接受清廷委任為中國工商業界代表，參加 1876 年美國建國百年費城世界博覽會的考察紀錄。當時的中國代表團由清廷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主辦，李圭是代表團中極少數的中國人。李圭筆下的倫敦市容規模宏富，誠不負泰西第一大都市盛名。更發現國際大都會倫敦的可貴現

象：衛兵、巡捕終日守衛卻始終衣著新鮮，精神抖擻；人煙稠密摩肩擦踵的行人居然安靜無嘩；還有為紓解地面交通壅塞而領先各國於1863年正式通車運行的倫敦地下鐵。在在展現高度現代化的秩序、紀律和技術，以及帝國政府卓越高超的行政和管理效能。此外，李圭也覺察倫敦的美中不足：其一，氣候多霧導致能見度低的不便，家用和工業燃煤造成空氣污染更有礙衛生，「煤煙雲霧，合而為一，都作黃色。雖新建屋，不數年已黝然」（李圭，頁279）。其二，晝夜馳驟的車馬導致不堪其擾的噪音污染。「聲若雷鳴，屋為震動。車中人並坐語不聞，夜間尤覺擾人清夢」，「居其間者，誠有所甚不堪已」（李圭，頁279、311）。對於物質文明相對落後的中國人李圭來說，現代性的體驗並非一面倒的令人艷羨，噪音干擾和空氣污染成為揮之不去的噩夢而令人無福消受。李圭就帝都倫敦存在的負面問題提出客觀反思和詰問，已能初步探觸到西方現代化的複雜性。

18世紀時象徵大英帝國霸權的倫敦，雖被世人熱情稱頌：「厭倦倫敦就是厭倦人生，因為倫敦具備人生所能提供的一切。」⁹其實，倫敦光明的背後實隱藏著外人難以理解的陰影。倫敦城實已分成貧富懸殊的兩個世界：資本家和權貴為了遠離東邊的工業濃煙、蒸汽和垃圾散發的臭味，倫敦的財富悄悄向西邊轉移和集中；無產階級、貧窮飢餓的英國農民、愛爾蘭和猶太人則落腳於東邊，刻苦耐勞地出賣勞力賺取微薄的生活費。陋屋和工廠盤踞在市區邊緣形成污穢雜亂的貧民區，與風光追逐享樂的城中富人住宅區成為強烈對比。一個倫敦兩個世界，東邊與西邊，城中與城郊。既華麗又污濁，既富饒又貧窮，既優雅又猥瑣，但肯定是生機勃勃、躍躍欲試。原來兩面性或複雜性才是現代性的真貌，不僅存在於殖民地、租界，也存在於列強國家內部。只是帝都倫敦陰暗悲慘的另一個世界，總是不存在外國旅人的遊歷視野而淪為被遮蔽的現代性。

⁹ 費爾南·布勞岱爾著，施康強、顧良譯：《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卷1，頁712。

英國國會，既是象徵英國最高立法權力的神聖地景，還是西方議會制度的發源地，故有「國會之母」稱號。作為以武力叩關，迫使大清開放國門的始作俑者，自然是晚清旅人必遊的朝聖地景：

英議政院即會堂，曰豪騷拍拉蠻（按：The House of Parliament），分上下二院。上院稱曰豪騷皮爾斯（按：The House of Lords）……。下院稱曰豪騷考門斯（按：The House of Commons）……。蘇、愛二地之議院紳額少於英者……。紳士由眾公舉，富者居多。下院紳士為英國最要之選，號令政事，每由此出，再上院核定。亦有倡議自上院，而交議於下院者。然必下情胥協，然後奏聞君主，以見施行，否則飭下再議。……每年自開堂之日始，爵紳皆集倫敦，至七月乃散。……惟每禮拜六與禮拜兩日不往。各國公使及本城人民，願者往聽。（張德彝：《隨使英俄記》，頁374-375）

同文館英文科畢業旋即隨使出洋的譯員張德彝（1847-1918），從1866年起以同文館首屆畢業學生身分而隨斌椿（1804-?）、赫德遊歷歐美；經歷隨使譯員而拔擢至倫敦使館參贊；1901-1906年間更任出使英、義、比國大臣而晉升清國外交官的頂點。隨使期間的張氏年輕又好奇，能捕捉異國新鮮的人文風景，也能操簡單英語與西人溝通互動，總是不憚其煩、不避瑣屑的將新奇事物詳加描述。上揭引文中以漢字音譯英語專有名詞，即反映張德彝通曉英語的譯員身分。惟其志在客觀述奇，少見個人感懷與思想抒發。文中客觀揭示英國議會制度分上下兩議院，突顯英國議會制度有傾向英格蘭與富人的趨勢。議會設立目的在疏通上下俾使無隔閡，因此議員們有權責開會集議，也開放庶民登記參觀以落實民主監督。

中國互古乃無議院政體、民舉之司者，國民非不智也，地形實為之也。蓋民權之起，必由小國寡民。……（英國）為立憲最

堅之政體而大地立憲政體皆法之，此為大地最奇特之事，亦絕無而僅有之事。……地僻海隅之一島，則羅馬及東方之制度亦不廣播，故能傳其舊俗而不至滅絕。……歐洲數千年時之有國會者，則以地中海形勢使然。……古舊文明之國，則必廣土眾民，而後能產出文明。既有廣土眾民，則必君權甚尊，而民權國會，皆無從孕育矣。……今大地既必行此政體，英得伏流之先，故在大地最先強。歐美得其播種之先，故次強。……及今移植而用之，人下種而我食之，豈不便易乎，何必怵他人之先我哉！……天道後起者勝也。（康有為：《意大利遊記》，頁140-147）

甲午戰爭（1894）翌年，康有為（1858-1927）進京會試，以布衣之身起草〈上皇帝書〉，聯合同榜舉人向光緒帝集體請願，力陳變法自強之策。康有為成為戊戌變法的旗手，揭開百日維新的序幕，卻曇花一現而亡命天涯，開啟歐洲十一國旅行。康氏慨然以神農遍嘗百草自誓，將遊歷、流亡海外以考察政治，視為上天賦予代尋救國神藥妙方。因此，康有為自稱「考政治，乃吾之專業也」。《意大利遊記》（1905）、《法蘭西遊記》（1907）兩編遊記，實康有為的政治考察記，也是他不斷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心得。¹⁰ 在跨國界、跨文化移動中，在不對等權力的國際政治現實下，進行個人、民族的自我協商、表意實踐。文章議論雄放，恢宏恣肆，感情浮誇激昂，建構了康有為特色的空間政治學論述。他歸結議院之制始於西方乃地形受限使然，非中國人智之不及，不能罪責先民，更自信地預告大清移植、挪用英國政體的樂觀未來。康有為鼓舞、安慰了有強烈現代性遲到感和自卑感的中

¹⁰ 見鍾叔河：〈尋找真理的康有為〉，與康有為：《法蘭西遊記》，一併收於氏編：《走向世界叢書》冊10，頁11-12。康有為《歐洲十一國遊記》中的第1編《意大利遊記》（1905）初版時，卷首「總目錄」中列有意大利、瑞士、奧地利、匈牙利、德意志、法蘭西、丹墨、瑞典、比利時、荷蘭、英吉利共十一國，此外還有三種附錄。但實際上在光緒三十三年出版第2編《法蘭西遊記》（1907）後，其他各編並未出版。

國知識分子，也自我肯定君主立憲政體才是可以延年益壽的「救國良方」。康氏對於西方議會制度的詮釋及政體主張，既承載個人意識型態的運作，也展現自我、大清與他者、西方之間的權力不對等及其協商斡旋之道。

(二) 法國巴黎 (Paris)：法國首都，歐洲第二大城、時尚與藝術之都

巴黎，法國最大城，曾經是世界最大的城市（16至19世紀），直到19世紀大英帝國強盛後，巴黎才讓位於倫敦而屈居第二位。從17世紀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時代崇尚藝術，奢華成風，將巴黎營造成令人留連忘返的花花世界、成人遊樂園。1852年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1808-1873）登基，進入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1852-1870），法王宣稱要為巴黎開闢新道路，完成運河和鐵路網鋪設，改善空氣和光線缺乏問題，允諾「要讓陽光照射到全城每個角落，正如真理之光啟迪我們的心智一般」。¹¹翌年6月旋即展開「巴黎大改造計畫」，任命奧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為塞納省省長並擔任巴黎大改造的總指揮。奧斯曼大刀闊斧地全面進行都市更新計畫：鏟平彎曲狹窄的街巷，打造寬闊筆直的林蔭大道，象徵巴黎浪漫精神的香榭大道就此誕生。建造整齊劃一的樓房、公園、廣場和街燈，設置先進完整的供水和排水系統，大幅改善巴黎的都市景觀和生活品質。拿破崙三世與奧斯曼聯手使巴黎脫胎換骨，成為時尚、藝術之都和現代性都會的典範：

巴里，法國京城也。……居人約二百萬。街衢闊大潔淨，兩旁多植樹木，綠蔭蔽道。列肆若蜂房，整齊華麗。屋皆六七層，每層戶扃護以鏤花鐵欄，塗金彩，異常美觀，英、美皆不及

¹¹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黃煜文譯：《巴黎，現代性之都》（臺北：國立編譯館、群學出版社，2007年），頁123。

也。無晝無夜，車馬往來不絕。居人喜遊宴，衣尚鮮華。他國之人來此，亦遊玩居多，無不艷羨之，甚有樂而忘返者。與英京倫敦並論之，倫敦為天下財貨薈萃之區，巴里為泰西第一名勝之所。(李圭，頁 295)

李圭比較巴黎的市政建設與倫敦的進步程度無異，惟市容異常講求華麗和整齊，則為英、美所不及。尤其是巴黎街頭流動的美麗風景，最是引人側目。巴黎人喜好遊宴，衣著華麗而講求流行，使巴黎成為各國遊客們樂不思蜀的玩賞聖地。然而，玩物適足以喪志，巴黎顯然不符合懷抱先憂後樂、匡世濟民的有志之士的期待。清朝中興名臣曾國藩(1811-1872)之子、肩負清國駐歐使臣重任的曾紀澤(1839-1890)即認為：「各國富人巨室往往遊觀於此，好虛糜巨款，徒供耳目玩好，非盡能專心壹志以攻有益之事也。」¹²光緒三十一年(1905)七月，流亡海外的政治家康有為親履名聞遐邇的巴黎卻大失所望：

往聞巴黎繁麗冠天下，傾親履之，乃無所睹。宮室未見瑰詭，道路未見奇麗，河水未見清潔。比倫敦之湫隘，則略過之，……且不及柏林之廣潔，更不及紐約之瑰麗遠甚。……路易十四欲以隱銷封建，乃特盛聲色之觀，園囿之美、歌舞之樂，俾十萬諸侯，樂而忘返，皆沈醉於巴黎，……而不欲還其荒山之宮壘以練兵治民。所謂此間樂不思蜀，柔肌脆骨，非復能以雄武抗叛。……路易十四不折一矢，得以統一王國。……至今遊其市肆，女子花裳之新麗，冠佩之精妙，几榻之詭異，香澤之芬芳，花色之新妙，凡一切精工，誠為獨冠歐美。然此徒為行樂之具，而非強國之謀。……巴黎市人行步徐緩，俗多狡詐；不若倫敦人行之捷疾，目力之回顧，而語言較篤

¹² 曾紀澤：《使歐日記》（臺北：黎明文化，1988年），頁 61。

實，亦少勝於法焉。……以吾人民之多，變法後之富，不數十年必過巴黎，無可羨無可愛焉！（康有為：《法蘭西遊記》，頁 203-207）

康氏放言巴黎無可驚美、無可觸懷，甚至「厭極而去，乃嘆夙昔所聞之大謬，而相思之太殷」（康有為：《法蘭西遊記》，頁 207）。康有為評議巴黎不僅主觀犀利，更試圖探求、詮釋巴黎逸樂成風的歷史成因。他採取比較性角度並提出個人品評：論都市規模和建設，放眼歐美列強都會之林，巴黎實屬平常甚至不足。廣潔不如德國柏林，瑰麗不如美國紐約，湫隘則有過於倫敦。至於世譽為獨冠歐美的巴黎時尚藝術，卻被康有為貶為「行樂之具而非強國之謀」。巴黎俗尚繁麗逸樂，看在救國心切的康有為眼裡更是惡極、厭極，只是徒然消耗國力、削弱民力。作為法王中央集權、統一王國、強幹弱枝的治國妙術誠可，但成為舉國矜誇相尚的風俗則是謬誤。人在異國卻心懷祖國變法圖強的康有為，完全無法欣賞巴黎的繁麗和逸樂，惟巴黎道路規畫完善、植栽綠化美輪美奐，因「路政關乎國體」故可供中國改革取法。

開隧道於地中，導水使行，日夜滾滾不休，人行其上者不知也。司水管者引燭導余入隧中觀之。隧旁別有弄，僅可行人。視其隧，則水清如碧，滔滔汨汨，……數百里相續不絕，此其中層也。其下尚有一層行水，亦與中層相等，而石柱更巨，因其壓力更重故也。導者請余觀下層，余恐火之滅也，遂出隧。既出而平地青草，蔥蒨可愛，蓋隧積之上層也。大抵此處為水之總管，由此引入巴黎，分為十管百管千萬管以供闔城之飲焉，工程可謂巨矣。問公司用費幾何？曰九千萬佛郎，蓋幾及中國之白金二千萬兩矣。然如此巨工，僅以一叟思其啟閉，月支薪工一百四十佛郎，殊覺簡便之至，亦可謂神妙不測云。（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頁 941）

巴黎不僅地上風景可觀，地下更是別有洞天，城上城下又是兩個世界。薛福成於光緒十六至二十年（1890-1894）銜命出使英、法、義、比四國，¹³以官方使節身分，由專人引導、參觀巴黎下水道工程。短短數行白描，既能分進、層遞說明下水道三層空間的功能；又能扼要點出參觀者入隧、出隧心情的對照；更能藉主客問答，慨嘆下水道工程的神妙不測、簡便之至。這些隱匿於地面之下、牆壁之間的異質空間和科學技術，實都市現代化的無名英雄，於利用厚生可謂居功厥偉。拜奧斯曼巴黎大改造計畫所賜，初步修成長達 600 多公里的巴黎下水道排污和自來水供水系統，成為聲名遠播、領先各國的現代化標誌之一。自 1867 年巴黎世博會起，巴黎下水道系統已成為世界第一座可供參觀的下水道博物館，作為國家政教空間的意涵不言可喻。法國文豪雨果（Victor Marie Hugo，1802-1885）在小說《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1861）中對幾世紀以來惡名昭彰的巴黎下水道進行了政治經濟學、人文地理學的細膩觀察和豐富詮釋。文中提及「下水道，就是城市良心，一切都集中在這裡對質」，「人類文明中一切的骯髒東西一旦沒用了，就全掉進這真相的陰溝裡，這裡是社會所有墮落現象的歸宿」。在雨果的歷史爬梳下，下水道成為巴黎城市、人類歷史的照妖鏡和醜惡淵藪。至於現代文明改造後的巴黎下水道，變得清潔、涼爽、規整、明亮，「下水道有了官方的面目」，污泥濁水也都「溫文爾雅」，連描述它的字眼也都是「高雅嚴肅」的。¹⁴敏銳的文學家總能見微知著地洞悉、揭露掩飾在現代化管線間人類文明的本

¹³ 參見鍾叔河：〈從洋務到變法的薛福成〉，連同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一併收於氏編：《走向世界叢書》冊 8，頁 11-56。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即據其生前所編成的《出使日記初刻》六卷，和死後由其子薛瑩中所編刻的《出使日記續刻》十卷所集成。

¹⁴ 維克多·雨果著，李玉民譯：《悲慘世界（經典全譯本三冊）》（新北：野人文化，2019 年），頁 1302-1316。雨果（Victor Marie Hugo，1802-1885）在費時 30 年，成書出版於 1861 年的長篇小說《悲慘世界》第 5 部第 2 卷〈利維坦的肚腸〉中細數巴黎下水道的演進史，揭露異質空間巴黎下水道的暗黑祕密與歷史。

質與真相。

奧斯曼以絕對理性、專斷無情的高效能與執行力，將有害於帝國的住房、工業和工人階級從巴黎市中心驅逐出去。執著於線條與對稱的講究，為取悅帝王而在巴黎留下英雄主義式的冒進、帝國主義結合資產階級的政治美學的痕跡。因此，奧斯曼的巴黎改造神話也不免受到許多批判。德國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在《拱廊街計畫》（*The Arcades Project*）中聲稱重建後的巴黎是「拿破崙帝國主義的紀念碑」。¹⁵ 奧斯曼的巴黎新道路系統固然美麗迷人，不僅改善巴黎的空氣和照明、交通和物流，更是迅速調撥帝國部隊以鎮壓動亂分子的捷徑。新巴黎不再閃耀中世紀滄桑迷人的古老光輝，消失的無數歷史建築和古老街道，使懷舊的巴黎人迷失在自家街道。老巴黎搖身一變為充斥寬闊華麗大道、高貴典雅店面、悠閒遊逛顧客的消費天堂。英國人文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更指陳：奧斯曼透過「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強迫巴黎走進現代」，締造一個「與過去全面決裂的神話」，「新空間關係對於巴黎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影響深遠，對於巴黎人的感性更是影響鉅大」。¹⁶ 在法國經濟史學家布勞岱爾眼中：「如果巴黎不存在，法國將比現在強大得多。」¹⁷

（三）美國首府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革命聖地波士頓（Boston）

華盛頓特區，為新興國家「美利堅合眾國」於 1790 年設置的首都所在地，為表彰、紀念國父「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而

¹⁵ 引自夏鑄九：〈作為現代性的神話——創造性破壞〉，收於大衛·哈維著，黃煜文譯：《巴黎，現代性之都》，頁 2。

¹⁶ 大衛·哈維：〈導論：與過去決裂的現代性〉、〈空間關係的組織〉，收於大衛·哈維著，黃煜文譯：《巴黎，現代性之都》，頁 19-37、123-132。

¹⁷ 費爾南·布勞岱爾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卷 1，頁 274。

命名。不同於英、法首都倫敦、巴黎皆集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光環於一身，美國經濟中樞非歷史悠久、商業繁榮的紐約（New York）莫屬。紐約先由荷蘭人於 1624 年建城並命名為「新阿姆斯特丹」，後來英國驅逐荷蘭勢力而代有之並改名為「新約克」。美國建國後，紐約一度成為首都（1785-1790）、美國最大城市及第一大港。將首都頭銜讓予華盛頓特區後，紐約的風華絲毫未減，且華盛頓可以少去工商大城過度喧囂和人口暴增的紛擾，單純定位為美國聯邦政府的政治中樞。華盛頓特區屋宇整潔，風景清幽，道路寬展外，參加 1876 年美國建國百年費城世界博覽會的李圭，即察覺、印證了華盛頓特區作為首都的與眾不同，亦即：「車馬不甚多，行人和藹謙遜」，「宮殿、官署、民居而外，園林最多」，「雖有河通輪船，而大商巨賈罕至其處」（李圭，頁 255-257）。

從殖民地崛起、歷經獨立戰爭洗禮，終於在 1783 年成為新興國家的美國，再經美墨戰爭（1848）、南北內戰（1861-1865）的勝利，開始投入海外帝國主義的冒險競爭，搖身一變為殖民宗主國，在 20 世紀初躋身強權之列。美國傳奇性的崛起過程，成為流亡海外的政治難民梁啟超（1873-1929）必訪的朝聖之國。光緒二十九年（1903）夏，梁啟超由流亡海外根據地日本橫濱起程，前往「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考察政治，以旅美十月間所觀察、調查而寫成《新大陸遊記》，並逐篇發表於海內外華文報刊。梁氏自道：「今日小弟出遊外國，乃承皇上密詔出外求救」。故北美之行乃銜命向旅美僑眾宣傳，以促進北美「中國維新會」的建立；同時考察美國政治及社會制度，作為中國變法革新的參考。¹⁸ 在此宏大動機主導下，題材內容自與傳統遊記迥異，即其〈凡例〉所定調：「中國前此遊記，多紀風景之佳奇，或陳宮室之華麗，無關宏旨，徒災棗梨，本編原稿中亦所不免。今悉刪去，無取耗人目力，惟歷史上有關係之地特詳焉。」（梁啟超：《新

¹⁸ 鍾叔河：〈啟蒙思想家梁啟超〉，與梁啟超《新大陸遊記》一併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冊 10，頁 393-394。

大陸遊記》，頁 419)

正如哀絲豪竹之後聞素琴之音，大酒肥肉之餘嚼鱸莖之味，其愉快在不能以言語形容者。全都結構皆用美術的意匠，蓋他市無不有歷史上天然之遺傳，而華盛頓市則全出於人造者也。」
(梁啟超，頁 481)

梁氏以「新大陸上一最閒雅之大公園」、「愉快在不能以言語形容者」稱許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以其既無他國首都的煩囂且無處不是歷史有關係之地。作為美國首府的華盛頓特區，既是一座貫徹國家權力、象徵美國精神而精心擘畫打造的城市，更是一座開放、露天的美國歷史博物館。它集合許多美國政治、歷史相關的人文景觀，存在許多「以國家之名」而規畫、興建的空間地景，例如：美國國會大廈、白宮、華盛頓紀念碑、林肯紀念碑等。

國會大廈 (United States Capitol，又稱國會山莊)，始建於 1793 年，由開國國父華盛頓親自奠基，為美國國會參、眾兩議院的所在地。是美國民主政治的精神象徵，更是制定聯邦法律、總統宣誓就職、宣講年度國情咨文所在地。建築外觀為新古典式建築，風格巍峨挺拔，以突出的圓頂及兩翼作為標記：¹⁹

都中建築最宏麗莊嚴者為「喀別德兒」(按：Capitol)……中央一高座為聯邦法院，其左右兩座次高者為上議院、下議院，其後一大座為圖書館，合稱為喀別德兒。喀別德兒之前，置華盛頓一銅像。其中央高座、中門、櫺楹、桷壁，蓋皆美國歷史紀念畫，其技或繪或雕或塑，其質或金或石或木，自殖民時代、獨立時代、南北戰爭時代以至近日，凡足以興國民之觀感者，無中不備，對之令人肅然起敬，沛然氣壯，油然而遠。

¹⁹ 「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旅遊指南」，「美國城鎮旅遊網：美國城市旅遊逛街指南」：<http://www.towngoodies.com/town:us-washington-dc>，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25 日。

(梁啟超，頁 481-482)

梁任公對於華盛頓特區國家歷史建築群的細膩描述及情有獨鍾，於晚清旅人遊記中格外突出。文中傾力描寫美國國會大廈建築群的空間地景，結構井然而層次分明，先敘外觀的宏麗莊嚴，繼寫內部空間的配置及陳設，字裡行間寄托個人感懷和評議。國會大廈作為華府最雄偉壯觀的建築，已經不言而喻地強力宣達它的空間意義，即美國民主政治的象徵。以空間配置而言，建築物中央高起的基座為聯邦法院，左右次高的兩翼分別為參、眾議院，空間被賦予的意義為——美國價值在於以法治為核心、民主為翼助。國會大廈前置華盛頓銅像，展現美國對於開國英雄的崇敬之意。中央高座內部陳列美國歷史紀念畫，透過繪畫或雕塑再現美國開國前後各歷史階段的重要史事。除了藉美術作品感動人心的力量以施行美國歷史教育，更能在空間展示中彰顯國家權力、統合國族記憶，達到凝聚認同的效力。甚至連外國旅人梁任公置身其中，也能感受足以興國民之觀感，進而令人肅然起敬：

喀別德兒之莊嚴宏麗如彼，而還觀夫大統領之官邸，即所謂白宮（White House）者，則渺小兩層垂百之室，視尋常富豪家一私第不如遠甚。觀此不得不嘆羨平民政治質素之風，其所謂平等者真乃實行，而所謂國民公僕者真思乎不敢自侈也。於戲！侷乎遠矣。全都中公家之建築最宏敞者為國會（即喀別德兒），最湫隘者為大統領官邸。民主國之理想，於此可見。（梁啟超，頁 482）

白宮，作為美國總統的辦公室和官邸，外觀是一幢白色石制的新古典風格的建築物，於 1792 年奠基動工，1800 年竣工並揭幕啟用。²⁰ 白宮內外空間和景觀所展現的平實儉約風格，強烈吸引了梁啟

²⁰ 「白宮（White House）」，「美國城鎮旅遊網：美國城市旅遊逛街指南」：

超的目光。上文對於國會大廈和白宮的外觀對比和詮釋頗能展現梁任公的深具慧眼，對於空間滲透展演的權力和魅力也頗能心領神會。透過兩組建築物外觀的湫隘和宏敞，遂使代表民主殿堂的國會大廈和作為國家公僕總統的辦公和住處的白宮，在空間展現、權力掌控方面表現出孰重孰輕的對比效果。此外，另一組隱藏對比——大清皇宮與美國白宮，才真正是梁氏慨嘆「侷乎遠矣」的主因。地處北京城中心的大清皇宮，建成於明永樂十八年（1420），既是明、清兩代皇宮，也是中華帝國最高權力的象徵，還是世界現存規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建築群。建築依照中國古代星象學概念，以紫微星象徵帝星，至高無上的天帝居於中天。對應於地上天子的皇帝居所，自然位居權力中心並且嚴禁庶民接近，故稱紫禁城。金碧輝煌的北京皇宮建築群採取中軸對稱方式，空間布局嚴謹有序，寸磚片瓦皆遵循封建等級禮制，映現帝王至高無上的權威。²¹以美國總統親民簡樸的白宮對比中國皇帝富麗崇高的皇宮，從建築規模、布局、裝飾和總體風格所展現的空間意義，正是民權和皇權至上的強烈對比。

波士頓，美國獨立建國的革命發祥地，現為美國麻薩諸塞州首府和最大城市。1620年百名清教徒從英國搭乘五月花號登陸北美洲所建立的第一個殖民地（即普利茅斯殖民地），與1630年另一批來自英國的清教徒移民所建立的麻薩諸塞灣殖民地，合為波士頓建城初期的主要居民。因此，波士頓被梁任公稱為「美國歷史上最有關係之地，而共和政治之發光點也」（梁啟超，頁474）。梁氏稱許英國清教徒移民墾殖北美、不辭千辛萬苦的冒險精神，更贊揚美國先民堅持理想，不惜八年鏖戰的膽識和毅力：「其胸中無限塊壘抑塞，其身體無限自由自在，其襟懷無限光明俊偉；而其一片獨立之精神，遂以胚胎孕育

<http://www.towngoodies.com/place:us-washington-dc-white-house/comments/us-midwest>，檢索日期：2019年8月25日。

²¹「探索故宮的歷史與文化」，北京故宮博物院：<https://www.dpm.org.cn/Explore.html>，檢索日期：2019年8月25日。

今日之新世界。」(梁啟超, 頁 475) 這段美國移民與獨立戰爭史, 令一向關注國民身體與國家政體的梁任公無限傾慕與嚮往:

今之人有欲頂禮華盛頓者乎? 吾欲率之以膜拜此百有一人也。……吾夢想此境者有年, 吾今乃得親履其地, 撫其遺跡, 余欣慰可知矣。菩利摩士(按: 今譯普利茅斯), ……觀所謂「新世界石」者, 即彼百有一人初至時登岸所立之地也。……往觀拋棄英茶之港口, 街角牆上嵌一銅碑, 銘曰: 1774 年拋棄英茶處, 下復紀其事略。……斯事與林文忠在廣東焚毀英人鴉片絕相類。而美國以此役得十三省之獨立, 而吾中國以彼役啟五口之通商, 則豈事之有幸有不幸耶? 毋亦國民實力強弱懸絕之爲之也。余徘徊久之……(梁啟超, 頁 474-477)

親歷美國建國的神聖紀念地景波士頓, 在在令梁氏流連忘返, 徘徊不去。究其原委, 無非是堪與清國痛史相連結: 林則徐(1785-1850) 廣州查禁英人走私鴉片, 焚燬禁煙卻莫名開啟喪權辱國的戰爭。而美國何其有幸, 不僅能有奇偉豪傑如華盛頓的領導, 更能擁有民心堅定響應, 故令梁氏唏噓不已。1903 年梁啟超在美停留十個月期間, 深入觀察美國社會, 再對照、反思自我國族後, 從國體的發達與否反思國民實力的強弱, 愛深責切的提出嚴正評議與警告: 梁氏認爲「吾中國人」無市民資格、無國家思想、無高尚目的, 故「只可以受專制, 不可以享自由」, 若貿然採行西方的多數政體, 則「無異於自殺其國」(梁啟超, 頁 555-562)。更批評中國人不及西人者多端: 做事沒效率, 不講求整潔衛生, 無秩序之極。再從行走比較: 西人行路, 腳步無不急者, 若不勝繁忙者然; 中國人則雅步雍容, 鳴琚佩玉, 「真乃可厭」(梁啟超, 頁 562)。西人數人同行者如雁群, 中國人數人同行者如散鴨; 西人行路, 身無不直者, 頭無不昂者; 吾中國人則一命而僵, 再命而僂, 三命而俯。「相對之下, 真自慚形穢」。至於言談方面: 西人坐談, 甲語未畢, 乙無攙言。中國人則一堂之中, 聲浪稀

亂，「真可謂無秩序之極」。最後，梁任公引「吾友徐君勉」說法，作為吾中國人和西人兩相比較後的沉痛結論：「中國人未曾會行路，未曾會講話。真非過言，斯事雖小，可以喻大也」（梁啟超，頁 562）。梁氏以嚴厲標準來檢視中國人，透過「自我否定」的機制，近乎不留餘地的全盤否定中國人的言行舉止與觀念思維，敢於道人所不忍道。推其故實鑑於「國民之體魄，即一國強弱所由基」。故以幾近振聾發聵的「吶喊」，力圖喚醒昏睡不起的國人。梁氏的呼籲實已開啟五四國民性檢討之先聲。

梁啟超對於世界共和政體的發軔國，美國的移民與獨立戰爭史雖然多所稱揚，對美國政體和國家發展的疑慮與忌憚卻也不少。梁氏認為：美國共和政體的特色建立在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間的合作與制衡關係。然而，美國政黨政治的流弊尤在選舉制度造成的舞弊與浪費。美國選舉頻繁較歐洲各國年平均數多達四、五倍之多，不僅勞民傷財更使高才志士不肯從政，更導致官員異動頻仍甚至廢弛政務。而選舉費用浩繁非黨派支持不可，則造成大黨獨霸政界現象，以致「美國政治家之貪瀆，此地球萬國所共聞也」，「此實共和政治之最大缺點也」（梁啟超，頁 578、580）。

門羅主義之本相，則所謂「亞美利加者，亞美利加人之亞美利加」，……及其變形，則所謂「亞美利加者，美國人之亞美利加」矣。而孰知變本加厲，……自今以往，駸駸乎有「世界者美國人之世界」之意。請觀盧斯福之門羅主義演說。……若不闕秦，將焉取之？（梁啟超，頁 485-488）

梁任公針對美國外交政策 80 年來的演變和剖析，可謂精闢中肯頗具洞見。這番發表於 20 世紀初的論述，驗證於 20 世紀百年間美國和世界歷史的發展更是若合符節。美國在一、二次大戰之際，儼然取代大英帝國的世界霸主地位，晉身為所向無敵的世界霸權國家，已然實踐「世界者美國人之世界」的國家願景且至今方興未艾。

三、理性與教化的空間地景

相對於舉目可見、置身其中即可感受其政教意義的神聖與紀念的空間地景，作為理性與教化的空間地景，其政教意義與空間意涵往往趨於隱微滲透。一方面，國家透過訓育技術與權力實踐的運作，將作為文化象徵的物質文明予以收編，透過蒐集、分類、保存於圖書館、博物館、博覽會等社教展示空間，藉以達成理性和教化目的。另一方面，代表國家權力、國族記憶和現代性的精神文明，則被滲透進組織規章、示範教材、操作流程和標準化的空間設計裡，成為學校、醫院、監獄等身體與精神的馴化空間，把被迫可見性原則強加給客體，透過空間設置對身體進行安置、控制及操練，並達到矯治、改造和教化目的。傅柯提醒：現代社會裡最高明的訓育技術和權力實踐已逐漸放棄壓制性、暴力性作法，反而透過開放性的傳播方式訴諸公開討論，使人自律地承擔控制自己身體的責任，同時也造就人的從屬性格（*subjection*）而自我馴化。²²

此外，傅柯透過所謂「異質地誌」（*heterotopology*）的論述，將人類社會的空間大別為三：除了「真實的空間」（*real space*）外，另有「虛構的空間」，如烏托邦（*utopia*）以完美形式呈現卻非真實存在的空間，還有一種存在於真實空間中卻又非常另類的「異質的空間」（*heterotopia*，或譯為異托邦）。傅柯嘗試對異質空間提出六個概念性的描述和舉例：第一，所有文化、所有人類群體裡，異質空間的存在是普遍化的，但它們的形式多變而沒有絕對的模型。第二，異質空間會依據它所處的文化共時狀態（*synchrony*）而改換其功能和意義，例如墓園。第三，「偏差性」的異質空間，用來安置並矯正行為偏離社會主流規範的人，例如精神病院、監獄。第四，它容許在一個真實地方，同時並置、累積與傳統時間或空間觀完全決裂的時空及其相關人

²² 蘇碩斌：〈傅柯的空間化思維〉，《臺大社會學刊》第28期（2000年6月），頁155-187。

事物，例如博物館、動物園、世界博覽會、遊樂園。第五，異質空間總是預設了開放和關閉的系統，不同於能夠自由進出的公共空間，例如學校、醫院、旅館。第六，它是「兩極化」的，被賦予既真實又完美的想像但同時又是補償性的幻想，例如殖民地往往並存進步和落後的反差，妓院和船舶總帶給使用者無邊無盡的美好夢（幻）想。²³ 本節所謂「理性與教化的空間」，正坐落於傅柯所謂的異質空間內，以下即將展開存在帝國內部的理性和教化空間的探索。透過晚清域外遊記的再現，詮釋殖民帝國如何透過空間設計和布署，滲透權力實踐以達致訓育和教化的效用，並掌握晚清旅人們在親歷那些理性和教化空間後，又會產生何種身體和心理、思想和感情的連動效應。

（一）監獄

監獄，是導正行為偏離常軌、觸法犯刑者的異質空間，也是國家對人民施行理性馴化教育的規訓場所。它設計了專人控制的開放和關閉系統，置身此間者必須釋出身體自主性和自由度。從觀念主張、實施辦法，再落實到空間布署、權力操作等，清帝國和西方列強所施行的獄政都存在極大的歧異。因此，監獄，也成為清人遊歷西方國家，尤其是官方代表的必定訪察處。

遊記以寫實見長的張德彝，將考察英國監獄的細節一一再現，頗能彰顯監獄如何透過空間布署而執行權力運作。空間設置：「樓高四層，內外光明，毫無塵垢」，每屋各居犯人一名，屋設有窗可見天空，「不以湫隘閉鬱其氣」。樓頂有高臺矗立，登三百級始至，可憑眺甚遠，以監看犯人行跡。「樓極下一層而入地者為黑牢」，凡有觸犯監律者，收此數日，以為懲治，夜不給燭且飲食稍次。「另有鐵房作梅花形者」，為凶惡犯人所居，每犯各居一瓣之中。花心設高屋一間，

²³ 索雅 (Edward W. Soja) 著，王志弘等譯：〈與米歇·傅柯同在第三空間〉，《第三空間——航向洛杉磯以及其他真實與想像地方的旅程》（臺北：桂冠，2004年），頁 207-219。

供獄官立而四望。另設有一室，以備親屬探監，中間以鐵柵隔開親屬與罪犯，獄官則與犯人並坐，藉以監視言行，以杜絕私弊。囚犯作息：初入獄則去其舊衣，改換囚服以便識別。每日三餐，麵包、湯肉、咖啡與茶皆足給，「每日卯初即起，躬為灑掃，料理衣服，梳髮洗面，務令整潔」。早飯後，同入講堂聽經，以一小時為度，此後作工至午餐前。餐畢，令犯人「在院按序而行，以舒筋脈」。散步後，觀書二刻然後再作工。晚飯後少息，同時滅燈令寢。管理犯人要項：「凡入獄，各就其所能，使執一藝。」待期滿釋歸，有技藝，有資蓄，可為謀生養家之用。「凡操作之時，與食息相間，以調其勞逸，故獄人無論老少，莫不氣體充實也」，至於態度惡劣，不服管教者，「毆官者，以麻鞭責之，其次則捶以木棍。非不施鞭撻也。越獄者，以火槍逐擊之。由此獄移彼獄者，以鐵索繫其右手，加以鎖鑰，犯人兩兩相連。非不施鎖銬也」（張德彝：《隨使英俄記》，頁 368-371）。

竊謂外國監獄，迥異中華。第一務取潔淨；第二飲食調勻；第三作息有節；第四可習技藝；第五則其總管、司事，一切體貼人情，處若父兄之於子弟。故凡遊覽其中者，非特不覺其為監獄，及犯人監禁日久，亦忘其身在此監獄也。殆將真以囹圄為佛堂也。（李圭：《環遊地球新錄》，頁 246-247）

考察西人的監獄設施和管理制度，一切體貼人情，讓參觀其間的李圭感到不可思議，直言絲毫不覺其為監獄而根本是佛堂。因此，當西人詢問李圭對外國處理罪犯的看法時，不禁提出質疑：「誠法良意美矣，然夫乃涉於過寬乎？」西人則答以西人性情多激烈，對待罪犯誠不得不寬：「若人之在獄也，吾儕視之，已不勝其苦。且彼非死罪者，故但拘其身體，鬱其志氣，使仍於拘鬱中有樂生之心，而後可冀其悔罪遷善也。」（李圭：《環遊地球新錄》，頁 246-247）

中西監獄設施和管理制度的迥然不同，實非民族種性不同而更源於清律和西律的觀念懸殊所致。中國舊律由倫理關係形成身分秩序

而呈現刑罰的差別對待，與西方法系以權利法為特色而講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制法和判刑截然不同。從鴉片戰爭後，清廷對外陸續簽定不平等條約，使十八個國家獲得了領事裁判權，中國的司法主權受到前所未有的侵害。例如：英國或法國人在中國發生犯罪行為時，歸英法官查辦。英法人民與各國人民之間的爭執，中國官員無權過問。甚至演變成受雇於外國人的華民，中國官員亦無權單獨審訊的狀況。各國所以不願放棄在華領事裁判權的主因，除了維護本國利益外，清律殘酷而罔顧人權的身體刑罰、缺乏辯護制度、沒有民法與刑、民訴訟法的制定，以及獄政的腐敗和暴虐等，都是導致各國不願放棄此一特權的原因。清廷為了廢除領事裁判權，取回國家司法主權，而發動的修法行動，其結果宣告了以「倫理法」為特色的中國法系，必須被西方法系的「權利法」所取代。光緒二十七年（1901）兩江總督劉坤一（1830-1902）和湖廣總督張之洞（1837-1909）所奏呈的「江楚會奏三摺」，可說是發動清廷修法的開始，其中「恤刑獄」和「採西法」為兩個最重要的制度性訴求，而採西法的十一項前置行動中也包括了「廣派遊歷」，即出國考察西方獄政和律法，藉以消弭中西法的鴻溝。²⁴

（二）學校

學校，是國家透過公權力對國民施行集體理性開發和馴化教育的規訓場所，藉以施行「正確」觀念、人格陶冶、知識教育，同樣預設了開放和關閉系統，置身其中的學子也必須釋出部分身體自主權和自由權。從戊戌變法時康、梁等人的呼籲變科舉、興學校，到1903年清末新政由官方主導的「癸卯學制」，引進西方學校和學制以改革教育，一直是洋務派訴求的首務，同樣也成為清人遊歷西方關注的對象。

²⁴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臺北：聯經，2001年），頁127。

按英規，凡幼童子女已屆五齡者，官即令之入塾習讀。初學教以語言文字。年逾十歲，教以算術、勾股、開方之法，是謂小學。年至十五，其愚魯不能深造者，即令就工謀食；其資稟特優者，令之學天文、地理、化學、光學、格物、醫學，以及機器、畫工等藝，是謂大學。大學院有二：一曰堪蔔立址（Cambridge），一曰教克斯佛（Oxford）。堪蔔立址以光、化各學為主，教克斯佛以各國語言文字為主。國大小文武各員，其出身必由此二學中試者，謂之正途。（張德彝：《隨使英俄記》，頁545）

上文描述的英國學制和教學內容，與歐美列強諸國大同小異。從小學到大學，一律按標準化的學制循序以進。凡是幼童已屆入學年齡（5歲至8歲，各國略有差異），官府即令入學習讀，違此則懲罰父母。故不分男女教育普及，無論貧富無不識字，且鮮有不閱新聞以廣見聞者。從同治五年（1866）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凡40年間張德彝八度下西洋，出國閱歷豐富。對於西人頗有好感：「咸以恥辱為重，終朝街市無有口角鬥毆以及詈罵情事。倘被人欺侮，控官請理」，「師之於弟，不施夏楚；主之於僕，不加唾罵；男女擁擠，不喧嘩，不出惡言；朋友往還，更無毆辱詈詬之情事焉」（張德彝：《隨使法國記》，頁480-481），言下之意似可歸功於國家教育有道。此外，「同文館英文學生」出身而非「科舉正途」出仕的張德彝，終生抱憾於「不學無術，未入正途，愧與正途為伍，而正途亦間藐與為伍」。²⁵張氏考察英國學校教育時強調劍橋、牛津大學各有專擅，英國大小文武官員出身必由此，「謂之正途」。其實，未嘗不是旅程中自我與他者相遇而導引出個人身世之憾恨。成立於同治元年（1862）的京師同文館，雖是晚清中國政府官辦的外語學校、中國最早成立的新式教育機

²⁵ 鍾叔河：〈航海述奇的同文館學生〉，收於氏編：《走向世界叢書》冊1，頁412。

構，卻是因應西人要求未來條約需以英語、法語為正本的規定，必須培育本國外語人才而設立的學校。相較於科舉正途出身，始終不受士大夫們的青睞和認同。張德彝從 1866 年以同文館首屆畢業學生身分而隨斌椿、赫德遊歷歐美，其後經歷隨使譯員、倫敦使館參贊、出使英、義、比國大臣。雖已晉升清國外交官頂點，卻始終介懷自己「同文館英文學生」的出身而抱持強烈自卑感。

其教術則工商，其教規則禮樂也。塾中子弟，言語有時，趨步有方，每入其塾，規矩森肅。夫喜逸而惡勞者，人之情也。難善而易惡者，人之習也。……英人慮此，特為官法督治之。不徇其教令，雖三尺童子猶拘諸改過房，俾習苦于布、麻、金、木諸匠作，以製為有用之器，故監牢亦學塾焉。英之眾庶，強半勤謹，不自懈廢。商賈周于四海，而百工竭作，亦足繁生其物，以供貿遷之需。國之致富，蓋本於此。（劉錫鴻：《英軺私記》，頁 207-208）

劉錫鴻（?-?）曾隨郭嵩燾出使英法，並擔任駐英國副使（1876-1877）。其出使期間遊歷諸國所錄，即《英軺私記》一書。劉氏揭示：英國社會貧富懸殊而自始即採分流就學的現象。「紳宦殷富或自延師，或公建學堂，以課子弟，皆不與貧兒混。貧而無力就學者，則收之以義塾焉。學徒皆寄宿于塾，供其衣服、飲啖，不聽他出」，他不僅意識到英國教育以工商實學為要務，更歸結出英國的富強實本於學校教育與時俱進。英國學制按部就班，能使百姓備足工商社會謀生無虞的基本技藝。英人自幼年入學起，即納入國家權力實踐所布署的異質空間——學校，接受言語有時，趨步有方，規矩森肅的理性與規訓教育。凡違反其教令者，「雖三尺童子猶拘諸改過房」，透過體力勞動並學習製作器物。在學校制度運作和師長監督下，學生被有形和無形的力量制約，毋需施以暴力性身體處罰，就能令學生被理性馴化並進行自我管理。而其教育普及的成果，足使「英之眾庶，強半勤謹，不自懈

廢。商賈周于四海，而百工竭作」，在民力即國力的國際社會中，現代國民的教養有成即國家致富的根本。

自稱「余之至泰西也，不啻為前路之導，捷足先登」²⁶的王韜，在 1867 年理雅各返國主持牛津大學漢學講座時，受邀同行並停留歐陸兩年多，曾於牛津大學、愛丁堡大學以華語講論漢學，對英國大學教育有更貼近的了解。見牛津大學生「悉戴方帽，博袖長衣，雍容文雅」，畢業學生皆能學以致用，「由國家銓選，授以職官」（王韜，頁 97）。王韜指出歐洲諸國不僅富強更能持盈保泰，歸根結柢的在於：「英國學問之士，俱有實際，其所習武備文藝均可實見諸措施者」。言下之意，對於清廷以詩文詞章取士的科舉制度頗有微詞。此外，更直言不諱地挑戰朝中群臣舊說：「琦善訪知女王自擇偶，奏言『是固蠻夷之國、犬羊之性，初未知禮義廉恥，又安知君臣上下』。」²⁷還正本清源地矯正西國、西人的形象：「其國以禮義為教，而不專恃甲兵；以仁信為基，而不先尚詐力；以教化德澤為本，而不徒講富強。歐洲諸邦皆為如是，固足以持久而不敝也。」（王韜，頁 125-127）

李圭隨中國代表團赴美參加紀念美國建國百年（1876）的費城世界博覽會，閱時八月有餘，歷十餘國，與英、法、美人偕處為多。李圭認為西人「敏爽靜潔，通達而不執滯」，「不尚虛文，專務實效」，「歷練多、見聞廣，而尤在讀有用書」（李圭，頁 299）。李圭對於西人、西學的觀察和見解，對比於中國士人專務八股帖括而見聞淺疏以致迂拘自囿，其批評之意實溢於言表：

大小生徒，每日何時集大堂，何時讀書、作文、寫字、學畫，何時和舒氣血，何時休息回家，皆有限至。……尚默識不尚誦讀。蓋默識則書之精義乃能融洽於心。……教法精詳，課程簡嚴，而不事夏楚，師徒情意洽貫。況以次遞升，不致有躐等

²⁶ 鍾叔河：〈王韜的海外漫遊〉，收於氏編：《走向世界叢書》冊 6，頁 21-27。

²⁷ 鍾叔河：〈中土西來第一人〉，收於氏編：《走向世界叢書》冊 1，頁 69-70。

幸進。此所以專心力學，不虛糜歲月，而可因材成器也。（李圭，頁 268-271）

李圭參觀美國紐約的學校，見學校管理一律按表操課，課程鐘點有定，學生應對進退有法。教學方法尚默識不尚誦讀，不施體罰而師生關係融洽。考核嚴謹，依次升級，不致有躐等幸進。此種制度化、標準化的教學與學校管理方式，使學生在一體適用的空間、時間管理下，便於統一施教與規訓。實與中國舊有學制和學校迥不相侔。中國塾學最大的特色就是沒有統一的學制，沒有標準化的作業流程，主要是由塾師掌控並透過經驗傳承而定。因此，教學空間、塾師資格、學費標準，甚至連入學和修畢學業的時間、教科書和教學方式等，官方並無制定統一標準。學塾教育往往因為低成本經營和規模小，基本上不採取分級教學，在學生異質性高的情況下，學塾對學童身體的管束十分嚴格，師生關係也相對嚴肅緊張。塾師只能像趙元任（1892-1982）所回憶的：「自清晨而日暮，時與小兒畫虎塗鴉，時與高材生講經論史」，或者是蕭乾（1910-1999）所說的：「從早到晚我們就扯著喉嚨唱著四書經文」，「老師動不動就用煙袋鍋子敲我腦袋，板子也越打越重」。²⁸

李圭還特別關注英美各國女學的興盛和普遍，英國大學無分男女一律考試入學，美國女師、女徒多至三四百萬人，並反思中國女學不張的積弊。他評述西方各國女學所以日興月盛，乃欲盡用天下之才所致。天下男女數目相當，婦女靈敏並不亞於男子，倘終歸埋沒豈不深負大造生人之意。因此，李圭批評中國俗語「女子無才便是德」，簡直是誤盡天下女子。中國輕女重男甚至有溺女惡俗，實由女學墜廢所致。李圭更申論自三代以降及於漢代，中國本有女學傳統：「考周官有女祝、女史，漢制有內起居注。婦女之於學，往古蓋有所用之矣。」

²⁸ 引自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頁 218。

婦學之名，見於天官內職，德、言、容、功，所賅甚廣，原非若後世只以文辭爲學也」，「三代之時，女學甚隆。降及後世，此事漸廢」（李圭，頁 271-272）。因此，唯有振興中國女學，輕視婦女之心方可改易，一國風俗之良窳，教育影響甚大。

我國幼童肄業於此，設出洋總局焉。……幼童現僅一百三十人。以二人一班，分住各紳士家，隨其子弟就傳習洋文。……局內延中華教習二人，幼童以三個月一次來局習華文。每次十二人，十四日爲滿。逾期，則此十二人復歸，再換十二人來。以次輪流，週而復始。每日卯時起身，亥正就寢。其讀書、寫字、講解、作論，皆爲一定課程。……嘗觀其寓西人紳士家，頗得群居切磋之樂，彼此若水乳交融，則必交相有成。……況吾華幼童，仍兼讀中國書，……無此得彼失之虞，是其法之良善者也。他年期滿學成，體用兼備，翊贊國家，宏圖丕烈，斯不負聖朝作人之盛意也歟。（李圭，頁 262-264）

李圭也順道造訪設於康乃狄克州（State of Connecticut）首府「哈佛」（Hartford，今譯哈特福），由清國駐美副使容閔（1828-1912）擔任副監督、主辦的「幼童出洋肄業局」（簡稱出洋總局）。上文詳實記載清朝官派留美學童的生活作息和學習狀況，課程設計務求中西學兼治且作息有時未有偏廢。李圭支持、肯定幼童學習成效並寄予厚望。²⁹當時負責這項中國學童官費留美計畫的駐美副公使，正是 7 歲入西塾，19 歲赴美深造，28 歲取得耶魯大學學位，「中國人而畢業於美國第一等之大學校，實自予始」³⁰的容閔。同治十一年（1872）起，清廷選

²⁹ 有關大清學童在美學習的出色表現，另見本論文「博物館、世界博覽會」一節。

³⁰ 鍾叔河：〈容閔與西學東漸〉，與容閔《西學東漸記》，收於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冊 2。容閔（1828-1912）廣東香山縣人，生於廣東澳門。7 歲時因家貧被母親送進西塾學習，準備日後爲西人服役。因聰敏伶俐，深得美國教師勃朗（Rev.S.R. Brown，?-?）喜愛，於 1847 年（19 歲）被攜往美

送 120 名年齡 12-15 歲的幼童，分 4 批逐年赴美留學，原定 15 年學成回國。隨著時間的推移，學童們逐漸習染美式生活而行爲日趨西化，少數學童有剪辮、改裝、改信基督教行爲而備受譴責；加上美國物價高漲，留學經費短缺；中美關係生變，拒絕中國學童入軍校求學，未能符合清廷自強運動亟需現代化軍政人才的殷切期望。凡此種種不利留學計畫的的憂患迭生，而駐美公使兼「幼童出洋肄業局」正監督陳蘭彬（1816-1895）更奏稱：「外洋風俗，流弊多端，各個學生腹少儒書，德行未堅。」³¹並力主全數撤回學童，復以朝中保守派官員群起抨擊該計畫將使中國學童美國化、成爲大逆不道的洋鬼而不復爲大清子民。因此，光緒七年（1881）6月8日總理衙門奏准將出洋學生一律調回，中國學童官費留美計畫在施行 9 年後正式宣告腰斬。無端被捲入清廷大臣的政治角力中，淪爲中美文化衝突下的犧牲品而被召回的幼童黃開甲，曾在信中形容半途而廢，黯然返抵「上海—監獄」時的悲憤心情：「當你跨進（上海）求知書院的門檻時，立刻霉氣燻鼻。這些陰暗似乎象徵著我們的命運。……這種侮辱刺痛著每一個人的心。而最令人可怖的是那些留學監督頭腦中荒誕不經的思想，使我們學未成而強迫返華。」³²而當初被指責剪辮、易服、改信洋教等行徑情殊可惡、浪費公帑，前功盡棄、後患何可勝言的兩位美國高中畢業的大清幼童容揆（1861-1943，容閔的侄子）與譚耀勳（1859-1883），因分別已被哈佛、耶魯大學錄取而毅然選擇抗旨、逃跑、拒絕遣返。留在美國完成耶魯大學學位後，二人也各自獲得駐美

國深造，1854 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1855 年返國效力並投入曾國藩主持的自強運動，積極引進西學，興辦中國第一座機器廠江南製造局，歷任駐美副公使兼辦中國學童官費留美計畫。後因參與康梁變法維新，戊戌政變後遭清廷通緝，於 1902 年取道臺灣、流亡美國直到病逝，享年 85。容閔晚年以英文寫成自傳《西學東漸記》（*My Life in China & America*, 1909）。

³¹ 錢鋼、胡勁草：《大清留美幼童記（增訂本）》（香港：中華書局，2009 年），頁 124。

³² 高宗魯編譯：《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新北：傳記文學，1986 年），頁 9-16。

公使館和紐約中國總領事館職位並效力祖國。³³ 事實勝於雄辯，以幼稚之年遠適異國、習染異文化，爭取改服易教的身體和信仰自主權的留學生們，其實從未背棄中國。

(三) 圖書館、美術館、蠟像館

華盛頓之圖書館，世界第一美麗之圖書館也。……其衣牆、覆瓦之美術，實合古今萬國之菁英云。……數千年來世界上著名之學者，莫不有造像，入之如對嚴師。其觀書堂中常千數百人，而悄然無聲，若在空中。觀書堂壁間以精石編刻古今萬國文字，凡百餘種。吾中國文亦有焉，所書者為：「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二十一字，寫顏體，筆法猶勁，尚不玷祖國名譽。(梁啟超，頁 481-482)

1800 年成立之初為「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目的為服務美國國會，後來又被賦予法定書庫的角色，陳列在美國出版的書籍複本以保護版權。隨著歷史推移和美國國力的日趨強盛，「國會」圖書館逐漸演變成「國家」圖書館，成為全美最大的珍稀書籍的館藏地，館藏之雄富更躍升為全球第一。惟美國華府國家圖書館所以令梁氏感動莫名，既非藏書的宏富珍稀也非建築裝飾的金碧輝煌，而在於空間布置環繞古今世界著名學者的造像，營造「入之如對嚴師」的氛圍，且館內聚集觀書者雖有千數百人卻能悄然無聲。其空間布署與氛圍，淋漓盡致地展現對知識的禮敬以及紀律感的森嚴，使人無限嚮往與肅然起敬。因此，梁任公不禁對於館中所編刻的中國文字投入高度注意，從文字意涵到書法字體一一詳加檢視、確認，方才肯定「尚不玷祖國名譽」。此外，從「國會」圖書館到「國家」圖書館，其空間意義也被不斷擴大。作為全球最大館藏量的美國國家圖書館，不只是一

³³ 錢鋼、胡勁草：《大清留美幼童記（增訂本）》，頁 150-155、145-149。

座偉大的知識殿堂，其蒐羅古今萬國珍稀圖籍，收編古今萬國文字百餘種，更是明白宣示美國掌握全球知識的強大實力與旺盛企圖。

譯者稱：「西人絕技，尤莫逾油畫，盍馳往油畫院，一觀普法交戰圖乎？」其法為一大闔室，以巨幅懸之四壁，由屋頂放進光明。人入其中，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岡巒、溪澗、樹林，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遝，放槍者、點炮者、舉大旗者、挽炮車者，絡繹相屬。……而軍士之折臂斷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睹。……情景靡不逼真，幾自疑身外即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捫之，始知其為壁也，畫也，皆幻也。夫以西洋油畫之巧妙，則幻者可視為真；然普法之戰逾二十年，已為陳跡，則真者亦無殊於幻矣！余聞法人好勝，何以自繪敗狀，令人喪氣若此？譯者曰：「所以昭炯戒，激眾憤，圖報復也。」則其意深長矣。（薛福成，頁111-112）

被李鴻章推尊為奉使績效卓著的古文名家薛福成，光緒16年（1890）春參觀巴黎畫院名畫〈普法交戰圖〉而留下名篇〈觀巴黎油畫記〉。³⁴油畫內容為1870年普魯士和法國的交戰現場。薛福成先寫油畫院的圓形展示空間裡，光線由屋頂投射，參觀者四周被巨幅油畫所包圍，使人不禁凝神屏息，彷彿人在畫中；繼寫人在室中極目四望，由遠而近，先簡筆勾勒遠處自然景致，再將目光逡巡在兩軍人馬交戰的現場並傾力摹寫死傷慘狀；再將視野挪移至天地，把戰地緊張凝滯的氣氛稍作紓解。至此觀者方能回神並意識到「幾自疑身外即戰場，而忘其身在一室中者」，走筆至此，既能呼應文首譯者所稱「西人絕技，尤莫逾油畫」，復能將文思抽離油畫畫面，轉就問答而抒發議論、點出文旨。薛福成再以「則其意深長矣」扼要作結，予人無盡思量。既明褒法人好勝而不忘前恥、發奮圖強，又寄託大清屢敗屢戰、喪權辱

³⁴ 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收於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冊8，頁111-112。

國，尤應痛定思痛，以雪國恥。值得注意的是，從譯者斬釘截鐵的回答與旅者觀畫後的反思，清楚揭露美術館存在的政教價值：藝術家高超的作品透過適切的空間展示，可成功發揮國家權力所欲彰顯的理性馴化功能，並透過集體記憶而凝聚認同、團結民心。因此，美術館不僅是並置、陳列不同時代畫作和藝術品的真實空間，更是製造如真似幻效果，滿足人們夢想的異質空間。

另有一種西人絕技，更讓晚清旅人目眩神迷、嘆服不已，即所謂蠟像。仿真蠟像的製法，約可追溯到西元前4世紀的馬其頓王國；在古埃及、古羅馬的殯葬文化中，也把蠟像置於墓穴或用於出殯隊伍裡；17至18世紀更是擴展到醫學領域，用來製成人體解剖蠟像。法國杜莎夫人（Madame Tussaud, 1761-1850）³⁵年輕時師從歌德施醫師學習蠟像技術並繼承其巴黎蠟像館。1802年杜莎夫人攜帶大批人物蠟像從法國移居英國並持續舉辦蠟像巡迴展，始將蠟像從小眾的專業技術，丕變、推廣成家喻戶曉的大眾藝術。1835年在倫敦貝克街成立全球第一座永久性的蠟像館展覽館——「杜莎夫人蠟像館」（Madame Tussauds London）。即薛福成所謂：「凡人之髮膚、顏色、態度、長短、豐瘠，無不畢肖，殆所謂神妙欲到秋毫巔者。聞其法，係一老媪創之，今盛於歐洲各國，未百年也。」（薛福成，頁111）

其衣冠、容貌、神情，以至頰上之三毫，眉間之一痣，一切逼真。正在游觀，則見立像六人中，忽走其一。諦觀之，走者生

³⁵ 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Madame Tussauds Hong Kong）：<https://www.madametussauds.com/hong-kong/zh-hant/%E9%97%9C%E6%96%BC/%E9%97%9C%E6%96%BC%E6%88%91%E5%80%91/>，檢索日期：2019年8月25日。杜莎夫人，原名瑪麗，生於法國斯特拉斯堡。年輕時跟隨母親的僱主歌德施（Philippe Curtius, ?-?) 醫師及蠟像工藝師學習蠟像製作技術，以製作名人頭像著稱。1789年歷經法國大革命的腥風血雨，1794年歌德施醫師過世後其名下巴黎蠟像館及館藏蠟像由杜莎夫人繼承。1802年杜莎夫人從法國移居英國並持續舉辦蠟像巡迴展，並於1835年在倫敦貝克街成立全球第一座永久性的蠟像館展覽館。2000年杜莎夫人蠟像館香港、紐約分館開幕，至今展館已遍布全球多達12個展館。

人，立者蠟像。不異乎其假者逼真，尤怪其能使真者疑假，而竟莫之能辨焉，其作俑之尤者乎。林少穆先生，雖未謀面，而心儀其人，不意於此遇之。其身不長，其貌則揚。顴平面圓，存我冠裳。惜覲面不能共語，以問安邊之方。（志剛：《初使泰西記》，頁298）

甫入門，即見有華人男女各一侍立門側，若司閤然，男則衣冠翎頂，女則盛服朝裙。余驚詢何人，以林文忠公對。蓋焚煙啟釁雖始於林，而因此得通商五口，皆其功也，故立像以紀其始。……直與生人無毫髮異，洵推絕技哉。室後別有幽邃之地，則皆古之叛人戮民不得其死者，藉以垂示尚戒。（王韜，頁111）

同治七年（1868），大清國向西方國家派出第一個外交使節團，使團由三位「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組成：前任美國駐華公使，受聘為清國效力的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以及兩位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清國官員志剛（?-?）和孫家穀（1823-1888）。此行任務在於「恭賞國書，前往西洋有約各國，辦理中外交涉事件」。³⁶志剛有《初使泰西記》一書，記述使節團於1868-1870年期間，出訪美、英、法、普、俄等國交涉換約及遊歷過程。無論是志剛或王韜皆對蠟像的逼真肖似、以假亂真佩服不已。講究「仿真」效果的蠟像館，無視於真實的、正確的時間和空間，錯置、混雜了古今中外人物於館中，充分突顯異質空間的特徵。分析清國旅人筆下的蠟像館，實具備下列功能：其一，它藉助名人偶像的光環，吸引觀者以滿足「近距離」接觸名人（其實是假人蠟像）的好奇心和夢想。其二，它能透過「古之叛人戮民不得其死者」，藉以垂戒並教化觀者。其三，它能扭曲歷史人物的真實形象，以崇高自我並貶抑、馴服他者。如最令晚

³⁶ 志剛：《初使泰西記》，收於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冊1，頁249。

清旅人震撼的林則徐蠟像，堂堂大清名臣身著翎頂朝服，居然被矮化成「侍立門側，若司閹然」，還被挪用為紀念中國開放五口通商的「大英功臣」。心儀其人的志剛以「惜覲面不能共語，以問安邊之方」，可謂道盡無限悵惘的家國之恨。

(四) 博物館、世界博覽會

博物館 (Museum) 的英文字源為 Muse，意指「繆思的神殿」。希臘神話中的繆思女神掌管思考、記憶、文學和藝術，因此希臘神殿裡會陳列藝術品、戰利品以崇拜繆思女神並提供人們觀賞。考察現代博物館的前身，約可溯及歐洲中世紀擁有財富和權力的教廷與教會，以教會名義收藏宗教聖品、聖人遺物以及美術品，並由神職人員研究和保管。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的梅第奇 (Medici) 家族以雄富的財力和鑒賞力，積極贊助藝術家並收藏藝術作品，1580 年成立「烏菲茲美術館」 (Uffizi Gallery) 以展示梅第奇家族累積數代的藝術珍藏。進入 15 世紀大航海時代後，探險、征戰世界各地所得的戰利品蜂擁而入，王公貴族們紛紛成立私人的珍品特藏室以誇奇炫富。18、19 世紀工業革命成功後帶動工商繁榮，促進資產階級新勢力的崛起，王公貴族相繼沒落，遂由國家建立館藏制度，接手保存並管理大量私人收藏品。1759 年大英博物館 (British Museum) 正式開放，即歸功於皇室御醫漢斯·史隆恩 (Hans Sloan, 1660-1753) 過世前的慷慨捐贈。1793 年以法蘭西共和國美術館名義而對外開放的「羅浮宮博物館」 (Louvre Museum)，其中不少館藏也來自舊時代王公貴族的捐輸。³⁷

³⁷ 博物館的起源和發展，參見呂理政：《博物館展示的傳統與展望》（臺北：南天書局，1999 年）、徐純：《文化載具：博物館的演進腳步》（臺北：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2008 年）。晚清域外遊記中的博物館研究，參見謝先良《晚清域外遊記中的博物館》（杭州：中國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09 年）、楊湯深：〈文化符號與想像空間：晚清域外遊記中的西方博物館〉，《江西社會科學》2012 年第 3 期，頁 109-113、陳室如：〈晚清海外遊記的博物館書寫〉，《成大中文學報》第 54 期（2016 年 9 月），頁 133-166。

晚清旅人在造訪歐陸時，幾乎必遊建築空間廣袤高敞、綜括萬匯的大英博物館及法國羅浮宮。王韜和李圭遊記中稱許羅浮宮「棟宇巍峨，崇飾精麗，他院均未能及」（王韜，頁70）。而羅浮宮的館藏宏富更是令人嘆為觀止：「院中藏書最富，所有五大洲輿圖、古今歷代書籍不下五十二萬部」（王韜：頁101）、「皆三千年前古物，自埃及、猶太、希臘等國地內挖得者」（李圭，頁286-287）。並極力推崇設館的立意深遠：「英之為此，非徒令人炫奇好異，悅目怡情也」、「所以佐讀書之不逮，而廣其識也，用意不亦深哉」（王韜，頁103）、「非有所矜侈也，其廣識見、益智巧，亦正欲與眾共之，制甚善也」（李圭，頁285-287）。凡此種種無不彰顯西方博物館的設立，隨著皇權式微、共和國崛起，也從皇族貴胄炫富好奇的社交工具、權力象徵，轉型、開放為代表國家形象、滲透政治教化、落實理性規訓的權力展演空間。

相對於中國皇家珍品猶藏諸宮中府庫，外人無緣一飽眼福，更無由增廣見識。中國旅人對於歐陸殖民帝國皆置國家級博物館，陳列來自世界各地的珍稀文物，其嚮慕之情溢於言表。經由他者以對照自我之後的相形見絀，更令康有為激動斥責中國人不保存古物、不如西人！西人對於古物皆知愛護，皆知嘆美，皆知效法，皆能保守之並引為國榮。「中國數千年美術精技，一出旋廢」，「致使歐美今以工藝盛強於地球。此則我國人不知崇敬英雄，不知保存古物之大罪也。然不知崇敬英雄，不知保存古物，則真野蠻人之行，而我國人乃不幸有之」（康有為：《意大利遊記》，頁116-117）。康氏更列舉古代中國人高度物質文明的發明，並發出義憤不平之聲：張衡（78-139）地動儀，諸葛（181-234）的木牛流馬，南齊祖沖之（429-500）的輪船，隋煬帝（569-618）的圖書館有開門掩門、開帳垂帳之金人等。雖有千萬文明之具，皆不能傳於後；雖有文史流傳，而無實形指睹。遂使我國一無文明實據，一任付之虛無，遂令西人輕我為無文，真可憤也！「古物雖無用也，而令人發思古之幽情，興不朽之大志，觀感鼓動，

有莫知其然而然者。遊歐洲之都會，觀古董之多寡，而文野之別可判矣」（康有為：《意大利遊記》，頁 119），顯然，康有為已視博物館之有無，為國族文野判別的文化象徵。

西方博物館對於中國旅人的「殘酷教訓」還不僅止於此，它更強而有力的宣示「勝王敗寇」的道理以及殖民帝國操弄下的權力遊戲。當中國人在「他鄉遇故知」，目睹西人將掠奪自中國皇宮的皇家瑰寶當成戰利品而公開展示、羞辱時，身為清國首任駐歐使臣的郭嵩燾，身分動見觀瞻使他異常謹重的留下一句沈痛評述：「凡此未嘗不咎當時諸臣誤國之深也！」（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頁 569），而隨行譯員張德彝則是「睹之不勝恨恨，乃辭出」（張德彝：《航海述奇》，頁 506）。康有為睹皇家玉璽流落異域更是痛心疾首，悲憤難抑：「來遊此乎，則傷心處矣！吾睹此傷痛。數千年之珍寶，乃至祖宗之傳授玉璽，皆不保而流於敵國。中國幾亡，黃種幾滅絕，為此故也。吁！嗚呼！」（康有為：《法蘭西遊記》，頁 214-218）

正室有各國戎衣，吾國御用甲冑及將士之服存焉。御用甲繡龍，銅片蔽足，二玉如意夾之，咸豐十年法、英聯軍入京得之者也。惟兵士衣寬袖掛、背心、博褲，直非武服。置之各國兵服比較中，非止慚色，亦覺異觀；蓋不倫不類，真非尚武之國也。……湖南地近南方，至熱，故多寬袍博褲。曾、左草草招練，因而不改。以此內戰則無礙，若投之萬國競爭之世，則為一笑具矣！（康有為：《法蘭西遊記》，頁 245-246）

當康有為遊法國武器博物館煙佛列武庫時，各國古今兵杖甲冑皆在其間，其精粗之比，得見武具進化之跡。取自中國戰場的中國戎衣武具，忝列帝國武庫間而公開陳列，徒顯不倫不類、徒淪為笑具，直令中國旅人無地自容、汗顏不已。環視周覽之後，又是一聲錐心泣血的痛：真中國之大恥也！

其實，博物館和考古學也參與了 19 世紀西方對於他者文明的定

義。將取自他者的戰爭掠奪或考古盜取文物，框限並臣服於帝國主導的知識建構和霸權論述中，被武斷的貼上原始或落後的標誌，任憑帝國占有和解釋，被用作證明西方的優越性，以及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攜手共謀的正當性。傅柯的《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966)、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的《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反覆論證、精闢透析了西方文明走上世界霸權的發展過程中，有關文化身分、帝國權力和知識論述之間的結構關係及發展演變。³⁸ 透過上述清國旅人遊記文本的再現，可以清楚印證「展覽」的教育和規訓功能，既是建構社會集體認同的有效模式，更是將他者邊緣化的重要機制。因展覽而引起的凝視裡，實滲透著權力的泛視之眼。

世界博覽會(Great Exhibition)創始於大英帝國，在1851年的倫敦水晶宮世博會立下了先例和典範，將博覽會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隨後掀起了「世博會時代」。³⁹ 以「世界」為主題的萬國博覽會，通過壯觀的展覽空間的布署，民族文化的身分經由展出物質而被清楚的分類和辨識。以「原始」手工藝品為代表的是低階、落後的文明，來自被殖民的非洲、中南美洲和日本除外的亞洲；以「先進」工業製品為代表的則是高階、先進的文明，來自歐美殖民帝國及亞洲的日本帝國。世界博覽會雖然被暫時性的設立在一個真實地方，同時並置、

³⁸ 西恩·赫迪斯(Sean Hides):〈物質文化和文化身分的譜系〉，收於孟悅、羅鋼主編：《物質文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20-232。

³⁹ 有關博覽會的起源和發展，參考陳占彪編：《清末民初萬國博覽會親歷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晚清域外遊記中的博覽會研究，參考王正華：〈呈現「中國」：晚清參與1904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之研究〉，收於黃克武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頁421-475、陳室如：〈晚清域外遊記的博覽會書寫〉，《輔仁國文學報》第38期(2014年4月)，頁125-147。

累積了來自不同時間和空間，以及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兩極化」的物質文明，強烈的展現作為異質空間的特性。在此異質空間裡，原始的他者文化被遠從海外絕域引見給參觀者，慘烈的人類社會進化論活生生地在此展演。參觀博覽會的觀眾，可以目眩神迷的在此完成民族和文化身分的辨識，而渾然不覺帝國之眼的全面凝視與權力實踐。有「資格」爭取主辦的國家總是最大的贏家：它可以展現國力並营造良好國際形象；宣傳先進商品並提升產業競爭力；凝聚認同並激發愛國情操。因此，進入 21 世紀的今天，這股世博旋風仍然方興未艾，愈演愈烈。

1876 年隨英人赫德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參加美國建國百年費城萬國博覽會的李圭，花費不少筆墨在辨證世博會之多利，以說服舉國滔滔的反對聲浪：「竊嘗謂美國創是會也，若似乎徒費。今而知其志在聯交誼，獎人材，廣物產，並藉以通有無，是有益於國而不徒費」，「可概見泰西諸國，費不輕易糜也。則創是會，要當為謀國之遠猷乎！」（李圭，頁 202-204）接著描述會場情況：各國遊人皆有，男女參半，日以數萬計，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圭遊此中，如入五都之市，萬寶雜陳，已覺心目俱駭」。繼而寫身著清服的中國代表，竟成為被他者凝視、圍觀的對象：「此間華人絕少，洋人習見者，又皆短衣傭工之流；若衣冠整肅，動止有常者，則是見所未見。無不以得一見，交一言為幸；而嘖嘖嘆美，敬禮有加。因之每至一處，竟若深入重圍，幾不可出。」（李圭，頁 205-206）至於大清國與明治維新後首度參展的日本國，兩國陳列的貨物內容及現場反應則是：

陳物之地，小於日本，頗不敷用。……布置有法，愈覺華美可觀。物件悉遵華式，專為手工製造，無一借力機器，……無不讚嘆其美。且云：今而後，知華人之心思靈敏，甚有過於西人者矣！……物產以絲、茶、瓷器、綢貨、雕花器、景泰器，在各國中推為第一。……若玉石器，幾無過問者。（李圭，

頁 206-207)

日本陳物之地，較中國大可加倍，位置亦甚井井。櫥櫃悉仿西式，器物亦間用西法製造者。……管理會務官等皆泰西裝束，……倘非髮黑面黃，幾令人東西莫辨矣。……皆日人仿西法自制。又小樣機器數具，亦極靈巧。……觀其國邇來於泰西制度、器藝造作，悉能用心窺其深。(李圭，頁 208)

上文分述清、日兩國的參展現場，一舊一新對比強烈而相映成趣。大清國堅持傳統本色，大日本國則求新求變，全力效法西人。李圭在揮筆詳述日本明治新政的成效後，語重心長的以日本反證清國，並歸結日本能夠維新富強的根本原因在於「任豪俠，競智巧，不甘以因循苟且自域也」(李圭，頁 209)。

至於主辦國美國的展出空間，約占全館的十分之三、四，李圭形容：「美國地大物博，金碧爭輝，遊觀者幾至目眩。」(李圭，頁 212) 其中較吸引他注意的美國商品：首先是物美價廉的瓷器，「初西國無瓷器，乃至在中國訪求，回國潛心考究，始得奧妙。今則不讓華制，且有過之無不及之勢」(李圭，頁 213)。另有一物則是「婦女束身物，用以使乳凸而腰細，以美觀也。……另有物如二碗，束胸際焉」。當對方詢及中國是否也用此物時，李圭答以：「腰細，我中國昔亦尚之，所謂楚宮腰是也。若乳凸，則正與華俗相反。」語畢，李圭還不禁感嘆：「噫！此殆與華俗纏足同一意，而患處且有甚於纏足者。」(李圭，頁 216) 19 世紀歐美婦女受縛於胸、腰，對照中國婦女長期遭受纏足所苦，皆彰顯女性身體自主權的不彰與女性地位的普遍受到不平等壓抑，因此被李圭等同並視。

此外，讓李圭印象最深刻的美方參展物件則是——「列通國學校、書院教習各法程，並生徒課稿」(李圭，頁 212)。李圭認為此一展示可使「勤者有以勸，惰者有以警，益自勉奮，日進於學，鼓勵人材，洵是法良意美」。尤其讓李圭驚艷的是清國官方選送赴美留學的

幼童百二十人，其課程習作亦陳列在內，成爲美國教育成果的另類展出品。漢洋並陳的策論洋洋灑灑，不僅漢文通順、洋文更令西人稱讚。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曾持續追蹤報導大清公費留美學童的新聞，同治十一年(1872)9月15日當第一批選送赴美幼童方抵達美國：「昨天到達的三十位中國學生都非常年輕。他們都是優秀的有才智的淑女和紳士」。⁴⁰此則報導與事實略有出入：中國選派留美幼童鮮少來自世族巨賈，七成來自留美學生副監督容閱的故鄉廣東香山。年齡在12至15歲之間，固然年輕無疑，但其實都是男童。由於蓄長辮、著長袍，在西人眼中自然雌雄莫辨。「他們機警、好學、聰明、智慧。像由古老亞洲帝國來的幼童那樣能克服外國語言的困難，且能學業有成。吾人美國子弟是無法達成的」(《紐約時報·社論》)。⁴¹大清留美學童的出色表現，可謂備受美國媒體的稱揚和肯定。留美幼童也受邀組團參與此次費城世博會，親身體驗人類文明的競賽和最先進的科技發明，如現場展出的火車、蒸汽機、縫紉機、打字機等。李圭發現博覽會場中備受矚目的百餘位清國幼童們，談吐舉止落落大方而心甚愛之，並表示充分讚揚和期許：「幼童聰敏好學，互相親愛，見人禮數言談彬彬然」，「在會院遊覽，於千萬人中言動自如，無畏怯態。裝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華式。見圭等甚親近，吐屬有外洋風派」，「西學所造，正未可量」(李圭，頁298-299)。

最後，李圭還是殷切地再三肯定世界博覽會的舉辦：西人萃天下古今之物於一所，其意良美，其心良苦，蓋欲推格致之學於舉天下。顧各國設會之意，原以昭友誼，廣人才，其著重猶在擴充貿易。李圭受命爲中國工商代表而參加美國慶祝建國百年、首次主辦的費城世界博覽會，最大的挑戰竟是顧忌國內保守派勢力而必須反覆申辯世博會立意。但是對美國志在透過主辦博覽會，向世界宣示美國作爲新興工

⁴⁰ 錢鋼、胡勁草：《大清留美幼童記(增訂本)》，頁59。

⁴¹ 高宗魯編譯：《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頁52。

業國家的強勢崛起，以及場地空間布署、參展物件擇取及權力滲透等，礙於代表立場的遮蔽與參觀現場的擁擠而難以參透箇中奧秘，實亦無可厚非。

四、結語

歐美列強首都，挾國家光環所聚，以穩坐一國首要之都、超級城市的寶座，幾乎是集一國政治、經濟和人文之薈萃，最能代表該國現代性的里程碑。法國經濟史學家布勞岱爾提醒：帝國首都雖以五方雜處、開放寬容為特徵，卻也是一座只事消費，不事生產，社會階級分化突出，為人詬病的畸形城市。首都作為一國的政治權力中樞，既是政治現實也是符號象徵，觸目所見俱是「以國家之名」而銘刻、展現國家政教信念的神聖與紀念的空間地景。在清國旅人的遊歷視域下：倫敦象徵大英帝國工業革命與世界霸主的榮光，最具崇高地位的神聖與紀念地景首推英國國會，而倫敦地下鐵則是代表英國工業技術傲視各國的先進產物。作為時尚藝術之都的法國巴黎，地上的新巴黎是法王拿破崙三世帝國主義的紀念碑，地下的巴黎下水道系統與博物館，則成為法國領先各國的現代化標誌。新興國家美國的華盛頓特區將經濟中樞讓予紐約而獨得「新大陸最閒雅大公園」的美譽，華府不僅是代表美國精神的象徵，更是露天的美國歷史博物館。

置身英法美列強首都及其相關神聖、紀念空間地景中。清國旅人王韜長期流亡在異質空間上海租界和香港殖民地，協助西書漢譯與中國經典英譯的編校，使他擁有相對寬鬆和開放的表意自由。客居英國並漫遊歐陸兩年間，他盛譽英倫為樂土，倫敦種種物質建設為中土所稀，直指大清不如英國的現實。接受清廷委任為中國工商代表而隨代表團參加1876年美國費城世界博覽會的李圭，發現倫敦大都會高度現代化的秩序、紀律和技術，及其不堪忍受的另一種現代性體驗——噪音與空污。同文館英文科畢業而隨使出洋的譯員張德彝，從英國

議會制度的客觀揭示中突顯「國會之母」有向英格蘭和富人傾斜的趨勢。自稱「考政治乃吾專業」的康有為，亡命天涯卻不忘代尋救國神藥妙方的使命。他以雄放恢宏，激昂浮誇的議論，鼓舞撫慰了有強烈現代性遲到感和自卑感的中國知識分子，歸結議院制度始於西方乃地形所致，非中國人智所不及，更預告大清移植英國政體的樂觀未來。拿破崙三世與奧斯曼男爵聯手打造的時尚藝術之都新巴黎，在李圭的比較下惟市容異常華麗和整齊為英美所不及。然而過度追求奢華享樂，使巴黎淪為玩物喪志、樂不思蜀的成人遊樂園，則是駐歐使臣曾紀澤、康有為等高度警惕和無可艷羨的，也頗能呼應布勞岱爾所言：「如果巴黎不存在，法國將比現在強大得多。」新興國家美國傳奇性的崛起並成為「世界共和政體的祖國」，使自道「承皇上密詔出外求救」的梁啟超格外關注並進行旅美十個月的考察。梁任公對於華盛頓特區和革命聖地波士頓等神聖紀念的政教空間，不僅情有獨鍾且體會、詮釋深刻獨到。國會大廈作為華府最雄偉壯觀的建築群及其空間配置，強力宣達其空間意義的神聖性，即作為美國民主政治的象徵，與以法治為核心、民主為翼助的美國價值。因此，國會大廈建築群的空間地景，使梁任公強烈感受到「足以興國民之觀感者，無中不備，對之令人肅然起敬，沛然氣壯，油然意遠」。而國會大廈與總統官邸白宮的顯性對比，更勾連出另一組隱性對比，即大清皇宮與美國白宮，兩兩對比之下，空間意義所彰顯的皇權、民權孰輕孰重已不言而喻。遂令梁氏不禁慨嘆「侷乎遠矣」。以致遊歷美國獨立建國的神聖紀念地景波士頓時，類似的歷史場景，使梁氏召喚出林則徐廣州查禁英人走私鴉片，卻開啟鴉片戰爭喪權辱國的國族記憶。美國之行，實讓任公痛澈領悟「國民之體魄，即一國強弱所由基」，進而開啟五四國民性檢討之先聲。

相對於舉目可見、置身其中即可感受其政教意義的神聖與紀念的空間地景，作為理性與教化的空間地景，其政教意義與空間意涵往往趨於隱微滲透。傅柯的空間權力與異質空間理論的啟發和洞析，將

有助於權力滲透的現形和空間意義的揭示。國家藉訓育技術與權力運作，使作為文化象徵的物質文明被收編於圖書館、博物館、博覽會等社教展示空間，藉以達成理性和教化目的。而代表國家權力、國族記憶和現代性的精神文明，則被滲入學校、醫院、監獄等身體與精神的馴化空間，成為組織規章、示範教材、操作流程和標準化的空間設計，藉此達到矯治、改造和教化目的。考察西人的監獄設施和管理制度，使李圭感到不可思議，直言監獄根本是佛堂。西人制度化、標準化的教學與學校管理方式，不分男女教育普及，無論貧富無不識字，鮮有不閱新聞以廣見聞者，且「不尚虛文，專務實效」，皆與中國舊有學制和學校差異懸殊。「同文館英文學生」出身而非「科舉正途」出仕的張德彝，強調劍橋、牛津大學各有專擅，英國大小文武官員出身必由此而「謂之正途」。未嘗不是旅程中自我與他者相遇而引出個人身世之憾恨。從「國會」圖書館到「國家」圖書館，作為全球最大館藏量的美國國家圖書館，其空間意義也被不斷擴大。不只是一座偉大的知識殿堂，更是宣示美國掌握全球知識的強大實力與「世界者美國人之世界」的野心。講究「仿真」效果的蠟像館，錯置、混雜了古今中外人物於館中，充分突顯異質空間的特徵。尤可注意者：它不僅能藉以垂戒並教化觀者，更能能扭曲歷史人物的真實形象，以崇高自我並貶抑、馴服他者。如堂堂大清名臣林則徐身著翎頂朝服，居然被矮化成「侍立門側，若司閹然」，更被挪用為紀念中國開放五口通商的「大英功臣」。西方博物館的設立，從皇族貴胄炫富好奇的社交工具、權力象徵，轉型、開放為代表國家形象、滲透政治教化、落實理性規訓的權力展演空間。康有為更視博物館之有無，為國族文野判別的文化象徵。而西方博物館對於中國旅人的規訓和教化更是殘酷。目睹中國皇家瑰寶被當成戰利品而公開展示、羞辱時，張德彝「睹之不勝恨恨，乃辭出。」康有為更是痛心疾首，悲憤慨嘆：「來遊此乎，則傷心處矣！」其實，博物館也參與了西方對於他者文明的定義。將戰爭掠奪或考古盜取的文物，框限並臣服於帝國主導的知識建構和霸權論

述中，以證明西方的優越性及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攜手共謀的正當性。「展覽」，既是建構社會集體認同的有效模式，更是將他者邊緣化的重要機制。因展覽而引起的凝視裡，實滲透著權力的泛視之眼。世界博覽會（Great Exhibition）創始於大英帝國，參觀博覽會的觀眾，可以目眩神迷的在此完成民族和文化身分的辨識，而渾然不覺帝國之眼的全面凝視與權力實踐。有「資格」爭取主辦的國家總是最大的贏家：它可以展現國力並營造良好國際形象；宣傳先進商品並提升產業競爭力；凝聚認同並激發愛國情操。

清國旅人出洋考察必訪列強諸國的國族政教空間，實透露遲到的現代性的焦慮及其背後揮之不去的亡國滅種的隱憂。因此，晚清出洋遊歷的中國旅人，無論官民多肩負考察列強國情、疏通中外隔閡，甚至尋求救國處方等重責大任。礙於華洋隔絕，文化迥異，又帶我族優越感偏見所想像的外國印象，在晚清一批批出洋遊歷而書寫的官方日記與個人遊記中，已逐漸獲得矯正和釐清。復能在旅行現場的空間展演與再現中，深刻感知自我與他者的差異及衝擊，並透過旅行主體的表意實踐進行個人意識運作與國家權力不對等的協商、交涉與反思。論者在後現代耙梳前現代的旅行文本，藉由歐美人文地理學與空間權力理論的運用和詮釋，冀能彰顯晚清出洋旅行的意義，使身體移動、空間展演和遊歷書寫，產生跨文化、跨時代交流與對話的豐富意涵。

徵引文獻

- 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著，黃煜文譯：《巴黎，現代性之都》，臺北：國立編譯館、群學出版社，2007年。
- 呂理政：《博物館展示的傳統與展望》，臺北：南天書局，1999年。
- 孟悅、羅鋼主編：《物質文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2002年。
- 徐純：《文化載具：博物館的演進腳步》，臺北：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2008年。
- 徐繼畬編撰，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 索雅 (Edward W. Soja) 著，王志弘等譯：《第三空間——航向洛杉磯以及其他真實與想像地方的旅程》，臺北：桂冠，2004年。
- 高宗魯編譯：《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新北：傳記文學，1986年。
- 陳占彪編：《清末民初萬國博覽會親歷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 陳室如：〈晚清海外遊記的博物館書寫〉，《成大中文學報》第54期，2016年9月，頁133-166。
- 陳室如：〈晚清域外遊記的博覽會書寫〉，《輔仁國文學報》第38期，2014年4月，頁125-147。
- 曾紀澤：《使歐日記》，臺北：黎明文化，1988年。
- 費爾南·布勞岱爾 (Fernand Braudel) 著，施康強、顧良譯：《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1-3卷，臺北：左岸文化，2006年。
- 辜振豐：《布爾喬亞：欲望與消費的古典記憶》，臺北：城邦文化，2003年。
- 黃克武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

-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臺北：聯經，2001年。
- 楊湯深：〈文化符號與想像空間：晚清域外遊記中的西方博物館〉，《江西社會科學》2012年第3期，頁109-113。
- 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著，李玉民譯：《悲慘世界（經典全譯本三冊）》，新北：野人文化，2019年。
- 錢 鋼、胡勁草：《大清留美幼童記（增訂本）》，香港：中華書局，2009年。
- 謝先良：《晚清域外遊記中的博物館》，杭州：中國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09年。
- 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1-10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1983年。
- 魏 源：《海國圖志（百卷本）》，長沙：岳麓書社，1998年。
- 蘇碩斌：〈傅柯的空間化思維〉，《臺大社會學刊》第28期，2000年6月，頁155-187。
- 「白宮（White House）」，「美國城鎮旅遊網：美國城市旅遊逛街指南」：<http://www.towngoodies.com/place:us-washington-dc-white-house/comments/us-midwest>，檢索日期：2019年8月25日。
- 「探索故宮的歷史與文化」，北京故宮博物院：<https://www.dpm.org.cn/Explore.html>，檢索日期：2019年8月25日。
- 「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旅遊指南」，「美國城鎮旅遊網：美國城市旅遊逛街指南」：<http://www.towngoodies.com/town:us-washington-dc>，檢索日期：2019年8月25日。
- 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Madame Tussauds Hong Kong），<https://www.madametussauds.com/hong-kong/zh-hant/%E9%97%9C%E6%96%BC/%E9%97%9C%E6%96%BC%E6%88%91%E5%80%91/>，檢索日期：2019年8月25日。